

全球策略信息

第十一卷 第二期 二〇〇〇七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中國需要保護主義和
弗·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理論
新“布萊頓森林”計劃特別委員會
拉魯旭先生與秘魯領導人的對話



社論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今年6月7日至9日，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國家元首在朝鮮首都平壤舉行了首次的高峰會議。這次會談不僅具有地區性的重大利益，而且更具有潛在的積極的戰略影響。朝鮮半島上的二位國家元首簽訂了一系列的重要協議。其中包括全面修建北方基礎設施的計劃。這一計劃與林登·拉魯旭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著名的“歐亞大陸橋”計劃在精神上一致的。如果二位元首的高峰會談所創造的和平環境能繼續下去的話，那麼拉魯旭先生所提倡的“歐亞大陸橋”中的有關朝鮮半島部份就會付諸實施。在韓國首都漢城，拉魯旭先生的思想早已廣為流傳！

6月13日，韓國的“大韓時報”報導，韓國政府以正擬創建設一條連接朝鮮半島上各個主要城市的高速現代化鐵路。文章還透露出這條鐵路所連接的各個城市的名字和每條支線的去向以及準備參與修建這條鐵路的國家。據外電報導：韓國政府正在雄心勃勃地尋求建造一條鐵路網以便連接中俄兩國的主要城市。除了中國將在這一計劃中起到巨大作用外，日本的高層人士也表示要鼓勵南北雙方的進一步的高峰會談。正如前日本政界一位高級官員所比喻的，這次朝鮮半島上所舉行的瑩北首腦高峰會談在歷史意義上可與1989年柏林牆倒塌來相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南北首腦高峰會談的國際影響還表現在俄國政府的堅決支持。普京總統計劃今年7月正式訪問朝鮮。教皇也正式接受邀請將對朝鮮半島南北方進行友好訪問。

在戰略意義上，南北方首會談大大削弱了主張在該地區建立所謂的，愚蠢的導彈坊御體系的爭議。鼓吹這一計劃的主要代表人，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及其共和黨內的一些人不得不公開承認他們叫指的潛在威脅不是朝解而是中國。因此，TMD計劃必須加快進行。

我們應該從全球戰略角度來觀察朝鮮半島上南北對話的影響。眾所周知，由於英美利益集團在今年4月和5月蓄意攻擊日元然後是歐元，所謂的美-日-歐三方協議已經開始瓦解、正處在這一形勢下，南北首腦會談出現了。這一形勢必將促成今年5月在泰國倡議要建立一個包括東盟六國，中國，日本和南北朝鮮在內的新地域性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據亞洲消息靈通人士透露給EIR時，中國和南北韓以及馬來西亞等國都十分了解全球金融體系正在分崩離析，同時，英美利益集團却正竭盡全力，用盡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犧牲亞洲各國的利益來維持這一舊的體系。目前。這些人對其前途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很樂觀。但是他的仍拼命抱着種種幻想。他的在新聞媒體中掩蓋事實，大肆報導歐洲。對於某些真相根本不預報導。例如今年6月5日，國際結算銀行在其每年一度的報告中指出，美國的金副泡沫是不能長期維持下去的，所謂的軟着陸是根本沒有保障的。“可是美國新聞媒體却祇字不提。與此國際，在亞洲，南美和歐洲，一個主張建立新的金副體系的運動正在忙極形成。為了加速這一過程，我們呼呼並鼓勵我們的讀者在各球各地廣泛散撥電到麼名耽洲議會的議員的所簽發的呼呼書。這些議員的加上來自40多個國家的代表的。勞工領袖，經濟學家和社會知名人士積極呼呼建是特別行動委員會，行動起來，建立新的“布萊頓森林體系”。目前，題為“全球戰略信息”的刊物刊登了大量的有關建立“新不萊頓森林體系”的文章，已在發行之中。

在封面。1933年羅斯福總統巡視美國，提出了著名的“新政”。美國“新政”中的許多措施與做法是美國經濟制度對“自由貿易”政策挑戰的最好例證。

全球策略信息

第十一捲 第二期 二〇〇〇七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拉魯旭先生與秘魯領導人的對話

中國需要保護主義和弗裡德裡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理論

新“布萊頓森林”計劃特別委員會

本刊自述

與 72 頁厚的英文《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執行策略評論)》，簡稱 EIR》相比，《全球策略信息》只是一個小小的文選。《執行策略評論》由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創刊于一九七四年。其新聞取自該刊遍及五大洲的專有渠道而不依賴任何有線服務。因其特立獨行的風格以及深入透徹的分析和計劃，《執行策略評論》常被一些政府當做獨立的諮詢顧問。又因《執行策略評論》不依賴替大公司或金融利益集團做廣告為經濟來源，所以《執行策略評論》編者的見解才能夠非但保持完全獨立而且常會引起爭議。

除了是月刊和頁數較少之外，中文的《全球策略信息》在所有方面都儘可能地照搬《EIR》原本，如戰略、歷史和經濟方面的分析等等。這些肯定是在任何其它的中文報刊裡找不到的！我們出版《全球策略信息》之目的不是為了求名得利而是為了給讀者一些政、經、文方面的思想指導以利于創造和發展一個新的文藝復興式的未來。

歡迎您向本刊提意見或建議。中文《全球策略信息》編輯部在美國新澤西州。函件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見封底訂閱單。

美國 EIR (全球策略信息)
c/o H.S.D.I.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Tel: (201)-641-8858
Fax: (201)-641-0453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

歐洲 c/o EIR
Nachrichtenagentur
GmbH, Postfach 2308
D-65013 Wiesbaden
Germany
Tel: (6122) 9160

拉魯旭先生與秘魯領導人的對話

林登·拉魯旭先生在今年二月份與秘魯國家高級財政官員和財政金融學者進行了電視傳播談話。下面就是全部的談話內容。由於所問的問題均是從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某些句子進行了壓縮。

林登·拉魯旭是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今年2月25日秘魯，利馬公共財經學院舉行學術與時局研討會·拉魯旭先生應邀從美國通過無線傳播媒體對五百餘位聽眾發表了題為“當前世界財政經濟發展形勢對美洲國家的影響”的重要講話。出席這次會議的有秘魯國家財政官員，經濟金融學者，外交官，外國使館的代表。此外，秘魯國家武裝部隊的高級官員，政界要人和大學生也參加了會議。拉魯旭先生的講話和隨後進行的討論都用西班牙和英語兩種文字在網路上播放。此次會議主持人由利馬財經學院，財政系主任佛吉利奧·新若普(Virgilio Hinope)主持。

他在開幕式上講到：“女士的·先生的，晚上好·代表秘魯國家財政委員會，我非常榮幸地向各位來賓表示最熱烈的歡迎，感謝大家能夠光臨出席秘魯國家財委所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今天，我們將通過國際媒體播放林登·拉魯旭先生從美國發來的演講，眾所周知，拉魯旭先生是位金融和經濟專家·他曾是美國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講演題目是：“當前世界財政經濟發展與形勢對美洲國家的影響。”同時，我還要介紹一下參加這次會議和研討會的還有：利馬國家公共財經學院院長，朱利奧·卡斯特羅(Dr.Julio Heza)博士，EIR駐秘魯執行主任路易斯·梅迪納(Dr.Patricio de Castro);太平洋大學教授，國際債務談判專家古勒摩喜勒摩·撒托尾(Guillermo Saettone);利馬大學財經教授路易斯·佩利斯(Luis Perez)，以及其他重要來賓。

開幕致詞

林登·拉魯旭：我們現在所處在的世界經濟形勢可以被描寫為這樣；現存的世界財經體系和貨幣結構，正處於分崩離析的邊緣。我所講的並不是預言某一天是世界崩潰之日。但是大家必須清楚：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整個體系上的問題，而不是周

期性的問題·從目前來看，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是無法逃脫即將來臨的世界經濟危機厄運的。

自從1971年8月以來，當我們放棄了由前總統羅斯福主張建立的“布萊頓森林體系”後，我們就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可行的經濟體系來彌補。這種潛在的危險發展到今日，造成了整個“世界貨幣金融體系的總危機。放棄了“布萊頓森林體系”後，世界經濟結構存在着許多缺陷，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存在着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

1971年，尼克鬆當政後，他採取的第一步就是結束當時的固定貨幣率，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浮動貨幣交換率體系。從此以後，曾經邦助美國，西歐等國經濟發展的戰後貨幣體系不復存在了。從1971-72年啟，整個世界實際上變得更加貧窮了。我們實際上是生活在過去的投資上，依靠的是真正的物質生產。現在，這些資本慢慢快消耗光了。通過這一系列的變化與發展，我們所面臨的是整個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注定要崩潰。

現在我們所處於的形勢很相似1923年時的德國，特別是1923年春夏之際的德國。當時的德國為了償還凡爾塞體系強加給它根本就無法償付的債務，就開始印發大量的鈔票。這種做法最終造成



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
林登·拉魯旭

了通貨膨脹的爆發。整個貨幣金融體系變得愈惡化，德國當局印發的鈔票就愈多。直到 1923 年春季，大量印發鈔票並沒有對德國經濟產生明顯的威脅。原因是德國當局同時也採取了一套防範措施。但是到了春夏之交，德國經濟開始爆發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發展到當年 10-11 月的時候，德國馬克出現崩潰，乃至印刷鈔票的速度都無法趕上價格上漲的速度。我們現在就處于相似的處境。特別是 1997 年以來，我們就遇上了所謂的亞洲金融風暴，和 1998 年中期的經濟危機。整個世界進入了目前無法挽救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最後階段。但是，就向 1923 年時期的德國政府的做法一樣，整個中央銀行和其它機構都想力圖挽救這個無法挽救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因此，你們不要期待着我可預言這個體系全面崩潰的日期。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一個小小的意外都可以造成這一體系崩潰的到來。但是，從總體上來講，我們今天所處的形勢很相似 1923 年德國的高通貨膨脹的險情。一些失去理性的人會繼續注入大量的貨幣以期待着現行貨幣金融體系殘延幾日，或是等到整個體系的徹底瓦解，或是等到某個事件的發生，最終使整個體系重新組合。

因此，我們必須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即對現存的世界金融與貨幣以及貿易體系進行全面的重新改組。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擯棄所謂的“全球化”理論，不得不重新回到國際貨幣之間相對固定的體系。我們還必須重新建立起享受高度主權的單一民族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並且通過各主權國的流通貨幣和貨幣體系來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這就是我所倡導的建立“新的布萊頓森林體系” - 國際貨幣與經濟體系。

走向新的布萊頓森林體系

擺在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從根本上恢復 1971 年以前或是 1966 年之前的布萊頓森林體系。這個重建任務必須是全世界範圍的。下面我就提出幾點不同的建議。

首先：我們必須回顧一下戰後布萊頓森林體系成功的經驗。可以說從 1945 至 1971 年，世界經濟體系被證明是成功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雖然成功，但是世界經濟體系並沒有包括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因此，我們必須加以修正。

例如：正如我一直在強調的，如果我們不把象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作為夥伴包括進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我們是無法建立一個健全的世界經濟體系，我們也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好新的世界貨幣體系。

我們必須通過改組目前的金融體系來使整個世界渡過經濟危機。目前世界的大部份債務必須取消。根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所欠短期債務共有300萬億美元，而全球總生產量祇有41萬億美元。顯而易見，我們是不可能繼續背着這債務進行改革的。

其他的債務，例如、信用債務和政府債務也必須要重新改組。但同時，就美洲國家而言，我們也必須承認，在目前的浮動貨幣交換率影響下，你稍加注意便會發現美洲各國已經付出了相當高額的退休金額。這種不合理現象相仍在繼續發展，主要是因為每次拉丁美洲各國貨幣遭貶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總要幹涉拉美國家，指令各國政府採取措施使其貨幣貶值。但是與此同時，并不對各國的債務進行調整或相對降低其外債的價值。因此所造成的債務危機，是拉美各國已經付債過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過去的30年間，這種不合理，不公平的強權經濟政策使窮國更加貧困。債務不僅沒有償還清。反而債臺高築。

因此，債務問題必須要通過重新改組世界經濟結構來解決。教皇保羅二世在千禧年歡慶活動時所提出的想法和建議也將應予以考慮作為一種解決債務的措施。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重新調整我們處理世界經濟的手段和方法。我們必須接受一個固定的貨幣交換率體系。我們應着重發展長期，低息率貸款或貿易貸款。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需要投資資本。根據1%的軍息率、他們將能夠支付起長期貸款。這些長期貸款將用于5年到30年不等的長期基礎設施項目。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通過發展各國的勞動生產能力，來最終償還債務問題。因此，我們現在就需要這樣一種經濟體系。

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在目前這種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是不可能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各國必須要有自己的保護主義政

策。否則，它們不能保證它們產品出口的價格將能使他們償還過去的債務。或是保證它們能夠獲得低息，長期貸款來減輕其債務。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保護主義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方面。要通過技術引進，資金引進等辦法來發展其農業設施，建立起私營企業和國家企業并存的經濟結構，以便普通提高勞動生產率。

我認為，像美國，西歐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從某種特度上也應包括擁有巨大技術潛力的俄國，應該集中力量向目前所謂的發展中或半發展中國家出口高科技產品和上提供長期低息貸款。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國際勞務分工。我們必須認真思考20年至30年的長期重建世界經濟的計劃。祇有在這些條件下，我們才能發展，共同繁榮。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我們必須同時運用新的觀念去思考如何盡行財政預算。我們不應該僅僅用價格來衡量一件產品，我們必須考慮到實物內容及實物費用等問題。例如，我們為了培養和造就一個人，一個家庭成員，具有專業知識或高科技知識，我們從他出生到培養他成材，至少需要25年或叫更多的時間。這個受培養的人需要某種程度的家庭生活水平或物質條件。他需要某種程度上的教育等等。如果我們拿一個國家的人口為例，我們就需要投資，還需要相當程度上的衛生保健設施等等。我們必須有公共設施工程。才能促進我們的事業發展。

因此，我們雖然能夠在世界各地找到勞工，但是我們不能從最低的工資去尋找勞工，我們應該考慮道什麼是標準工資。為了培養和造就可從勝任高科技工作的人才，我們必須從家庭角度，實物生產角度和服務行業等角度去考慮標準工資到底是多少。

此外，我們還必須建立一套新的金融財政標準，并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當然，各國政府之間應該進行對話，討論如何制定貿易條件或是貿易價格標準等。我們必須考慮到投資問題，例如：為了讓某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我們究竟需要提高什麼產品的質量，因此，投資數目到底有多大。我們還應考慮到每個家庭平均消費的水平，以及每個家庭的就業水平如生產能力水平。換句話說，就人類生活條件和生產力水平，我們去估算每一平方公裏有多大生產能力。

我們必須為私營企業和公共事業建立新的經濟標準，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而各國政府必須要以實際行動來支持，其中包括制定完美的法律制度和協調各個不同的職業部門之間的運做。

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我對這一前景是持樂觀態度的。我知道目前的世界形勢如何嚴峻，我對國際局勢的了解不差于任何人。我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處在某種程度的崩潰邊緣。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近鄰厄瓜多爾這個主權國家目前正被外國經濟所吞吃掉。我們也看到哥倫比亞在解體，委內瑞拉也面臨相似的厄運。此外、在外國資本的控制下，我們還看到了阿根廷和巴西所面臨爆炸性的危機。面對我們今天的世界，非洲充滿着災難。印度尼西亞也瀕臨解體。印度雖然是一個擁有一定實力并在進步中的國家。但是它那 10 億人口中有相當多的窮人。中國雖然正在取得改革開方以來的巨大成果，但是它缺乏高科技力量。因此，它不能維持它目前的 7%5-8% 的增長速度。如果中國不能保持其制訂的增長速度，中國政府就沒有能力達到人民的要求，特別是中國內地人民的需求，更談不上治理風化和貧困的土地了。實際上。整個世界目前都面臨這種危機。

所以，我很清楚目前世界的形勢。實際上，美國的經濟也並不景氣。我們雖有四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他們擁有比他們想象得多得財力。我們美國現在有更多的百萬富翁。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借來的。有些人是從私人那裏借來的，他們是不可能償還這些債務的，而有些人則是通國網絡從世界各地借來的。祇能這樣，美國經濟才能賴以生存下去。我們對目前美國財政收支平衡分析一下，便可知道美國每年實際上是赤字 3 千多億，我們絕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我們現在靠日元或其他外幣生存，人們大量套購美元或西歐貨幣然後投資到美國市場。美國市場的繁榮是一種“泡沫”現象。整個金融市場隨時可能爆炸。

我認為歐洲的形勢也不樂觀。英國是靠無形的收入支撐着。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如：德國，意大利和法國也都面臨困難重重。此時的俄國雖然

暫時地穩定下來了。這部份原因是國際石油價格的增長，其結果是別的國家深受其害。亞洲的問題會繼續惡化。誰能預料下周或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我們面臨着全球性的災難。美國不再是一個享有巨大繁榮的經濟大國。事實上恰恰相反，今天有 80% 的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比 10 至 30 年前要低得多。除經濟災難外，我們還面臨着社會危機。我們美國已經喪失掉了工業生產能力和農業。我們號稱富有，但是我們與像厄瓜多爾這樣的窮國一樣，仍面臨種種危機。我們將不得不重新建設。

我們需要一次震動

我們需要一次震動。但是我還是持樂觀主義態度的，下面讓我解釋一下我為什麼在政治上對我們的前途持樂觀的態度。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轟炸了珍珠港，發生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就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我可從這樣講，大部份美國人仍然相信戰爭祇會在歐洲和亞洲進行，美國根本沒有必要被拖入戰爭·但是，當日本人的炸彈掉在我們頭上時·轉天，羅斯福總統就在國會向日本發表宣戰聲明·此時，全體美國人民突然改變了態度。炸彈及震蕩產生了作用。美國人民丟掉了幻想。開始面對現實。我們當時的確面對了現實，我們有英明而能幹的總統，我們戰勝了暫時的困難。我們終於勝利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形勢是美國人民普遍生活在幻想之中。我認真比較了美國選舉中的種之行為。幾年前。我在底特律選區所得到的選票比老布什和小布什都多，并且我是在困難的情況下，獲得多數選票的。但是事情會向難以預料的方向發展。我反復彈調。現在美國的選民所做所為很相似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時期的無產者。那時，羅馬無產者生話在施捨和供給上，同時還存在着種種幻想。他們祇知道去娛樂場所消磨時間，觀看鬥獸表演。每天的生活均是如此。

現在的美國人民也相似般地生活在追求娛樂和虛幻之中。美國選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政治態度、以及他們對世界形勢的看法都來源于他們的

價值觀點。他們終有一天會意識到。整個金融體系正行將崩潰，震醒他們的那顆炸彈會從天而降。一個巨大根本性的變化就會發生。

我也看到了歐洲也將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一顆金融炸彈即將掉下來。西歐的人民將感到這巨大的震動，他們的態度也將發生變化。我們還會看到世界其它地力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此，我認為我們面臨着類似 1929 年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形勢。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我們選舉了羅斯福為我們的總統。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震醒了全體美國人民。這次，美國人民還會被震醒。而震醒他們的是一系列橫掃世界的總危機：包括社會危機，金融危機，以及象巴爾乾等地區那樣的局部戰爭與衝突。就象 1930 年代，二戰前夕一樣，這一系列由經濟危機而引起的社會危機以及國內動亂最終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爆發。

我們正走近這樣的危險。隨着各種危險的日益加渾，隨着各種幻想的破滅，人們會逐漸地變得現實，認識到現實的局勢。從我們過去的經驗來看，我們必須要經歷某種挫折後。才會腳踏實地的面對現實。但是，人民是不能長期忍受痛苦折磨的。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對前途持樂觀態度、和精明強幹的領導層激勵人民團結起來，從事一項偉大事業。

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形勢也是全球性的現實。我知道象秘魯這樣的國家，或中南美的國家，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期待着美國行善，樹立良好的榜樣，告訴全世界如何擺脫或克服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我對克林頓總統很有信心。我過去的確有過失望。眼下，不想去揣測美國是否應該繼續朝着逆歷史潮流方向前進，人民似乎認為美國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認為，人民祇有受到衝擊時才會醒悟，才會去尋找變化。我本人希望在今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正常提名之前，就發生這種社會衝擊。這是一件很可能發生的大好事。

我還希望世界各國人民積極準備響應美國總統所提出的緊急措施方案。例如：美國總統宣布：“讓我們召開由各國代表參加的特別全權會議，共同討論我們目前世界政策中的幾個基本問題以便

探索我們如何擺脫這次的世界大危機。我還希望世界各國將接受美國總統的建議，如果真發生這樣事情的話，請準備這樣做。

我本人也會支持美國總統的。現在似乎美國不會這樣做。但是，如果一旦爆發總危機的話，我們也許會推動美國率領全世界走出危機。這是我的希望，我想也許我會更好地回答你們的問題，并不是僅僅停貿在總結我的觀點。

問題與回答

梅爾伽裏和·西諾普：我們現在開始提問。第一為提問的是希托尼：

為什麼要恢復到黃金儲備的標準

希托尼：晚上好。我很高興，也有些驚訝聽到拉魯旭先生的演講。首先，你所講的內容很有趣。然而，我對拉魯旭先生的主要觀點有些疑問。首先，為什麼我們要在 1971 年和 1973 年放棄固定交換率的標準？我們為什麼不首先去評估一下當時的形勢呢？僅僅想恢復道那些聽起來好聽或以前似乎穩定的固定交換率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我們應該把精力放在找出當時主張放棄固定交換率的原因。我個人的理解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固定交換率體別存在着許多觀念上的問題。特別是對以生產出的產品的爭議問題。這種情景迫使我們不能夠再繼續維持這種體制了。根據亞當·史密斯時代的經濟理論，產品的價值是由他們所包含的勞動數量所決定。而產量的數量總是在增長。我們是不可能無限制地重新回到黃金價值觀念上去的。所以我想更多地知道你主張重回固定交換率體制的計劃內涵到底是什麼？

林·拉魯旭：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的發生過程。至到 1930 年代，我們一直遵守黃金標準體制。這個體制始于 19 世紀 20 年代。當羅斯福總統入主白宮後，他已經意識到美國不能繼續容忍英國制定的黃金本位標準制。

羅斯福總統認為。流通貨幣的保障基礎不應該是黃金。相反。正如漢米爾頓和林肯所主張的那樣，應該是建立在實物經濟基礎上。從 1861-

1876 年。在林肯的經濟主張指導下，美國的經濟增長，包括技術增長有了突破性的進步。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利堅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體和技術上最先進步的國家。

當時，這一偉大成就之所以能夠獲得主要是使國家信貸業務現代化。通過建立一個國家銀行 / 金融體系來調整全國的信貸業務。這樣一種國家金融，銀行體系最初建立于漢密爾頓時期，後來又在門羅總統和約翰亞當斯總統時期重新出現過。因此，就英國建亡的黃金標準體制而言，你能夠把你的貨幣投放入流通領域嗎？

回顧美國歷史上的幾次經濟技術大發展時期例如：林肯時期，羅斯福時期還是重建二戰幾的繁榮時期，這些大發展的基礎是建立在以美元為美國國家信貸單位的基礎讓的。我主張以美元為基礎並非僅對黃金的作用，而是主張要以美元為美國經濟的支撐力量。

為了達到這種目的，羅斯福總統主張建立一個黃金儲備體系。在 1940 年代，羅斯福又主站建立的著名的“布萊頓森林體系”。我們一致同意建立一個黃金儲備體系，在這個體系裏，黃金被視為一種普通的商品，而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我們不能用黃金作為固定價格的依據。黃金祇能作為一種流通貨幣的計量標準去確定生產價格。

除非我們的確需要某種調整，否則，我們應該把我的流通貨幣固定在哪個標準上。祇要這樣我們才能解決收支不平衡問題，如果出現赤字現象，我們也可以用黃金來消除赤字。到了 60 年代，在肯尼迪政府執政期間，肯尼迪總統試圖重新采用當年羅斯福總統的政策來處理國際關係和世界經濟政策。不幸的是他被暗殺了。他遇刺後不久，美國便走向了一條相反得道路。從長遠意義上講。他將對美國產生非常惡劣的副作用。一方面，美國的確從肯尼迪總統所倡導的太空發展計劃中得到好處。美國太空發展計劃是當代史上美國經濟最成功發展的一個例子。由於國家對太空項目及其研究計劃的大量投資所造成大批中小起營投資者參與是美國投資史上空前未有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經歷了長達 14 年的越南戰爭的消耗。整個美國社會都經歷了這場戰爭所引起的社會動蕩和

文化衝擊。這場戰爭幾乎摧毀掉我們的整個經濟。

在這段時期，我們也經歷了另一個事件，雖然它不發生在美國本土，但是對美國的影響很險。請記住，美國從來不是世界上金融超級大國，除了很短一段時間外，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現在，乃至在過去的 40 多年裏，世界的真正金融強國是倫敦，是英帝國的金融體系。例如：在今天全世界的金融交易中，有 90-95% 的交易是在倫敦進行的。

所以 1963 年的政變發生時，這件醜聞導致了麥克米蘭政府的下臺。在經歷了一段不光彩的休整後又出現了哈羅德 · 威爾遜政府。在兩屆政府中，威爾遜本人是我所知道的仍健在的英國政治人物中對英國經濟破壞最嚴重的人。

在整個通貨膨脹過程中和越南的壓力下，以及其他諸因素的影響下，美國開始了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與以前的通貨膨脹相比，此次的影響很嚴重。在這種生力下，我們做出了愚蠢的選擇，讓尼克鬆入主白宮。

1968 年。正值貨幣金融體制改革之際，約翰遜屈服了各種壓力，退出了總統竟選。當時我們所應該做的是提高黃金的價格作為儲備的單位，以適應實際的通貨膨脹。然後再用黃金儲存去彌補赤字所帶來的不平衡。問題的另一嚴重方面是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已經從鼓勵發展經濟的政策到扼制經濟發展的政策。

因此，當我們美國可以與西歐，特別是德國聯合向全世界各地以長期低息貸款提供高技術和產品時，我們却失去了重建世界的機會，走上了一個相反的方向。我們政策是：“我們不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幫助開發他們的資源。我們要把他們的資料留給我們歐美民族後代去享用。”我們變得很貪婪，我們制定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另外一件事對美國產生作用的是 1962 年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剛剛從導彈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美英蘇三國重新制定了各國的經濟發展政策。直到 1962-63 年期間，一個影響羅斯福總統政策得以執行的重要因素就是蘇聯，美國和歐洲都在吵吵嚷嚷地談論美蘇兩個核大國之間可能有爆發核衝突的潛在危險。與此同時，各國的政策發生了變化，特

別是美國和歐洲的政策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其標志是，德國阿登納的下臺標志着德國政策的變化。這一變化後來又加速了德國反對厄哈德勢力的形成。法國的戴高樂也頻頻受到衝擊。最後導致他于 1968 年的下臺。

所以我們經歷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政策的變化，這個變化是不應發生的。我個人認為：1971 年以前的世界是二戰以來最好的，最穩定的世界。現在的問題是由于采用浮動交換率制度，我們似乎已經接受它為一種新的政策。目前，世界貨幣體系正在全球範圍內開始瓦解。我們今天在薩爾瓦多和世界其他地區所見到的恰恰反映了長期以來世界經濟體系的自我崩潰的必然趨勢。而這些制造崩潰的人應該在制定愚蠢政策之前對經濟有所了解。

然而，仍然可以哄騙人民的關鍵是所謂的經濟循環論。一代人所犯的錯誤可能一兩代人之後才能得以修正。我們在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嚴重的。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危機恰恰是這種錯誤所導致的結果。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事，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要回到 70 年代之前的經濟政策。我們要在所犯錯誤的地方重新爬起來，重新建立一個新制度而非力圖保持現有的體制。祝秘魯發展繁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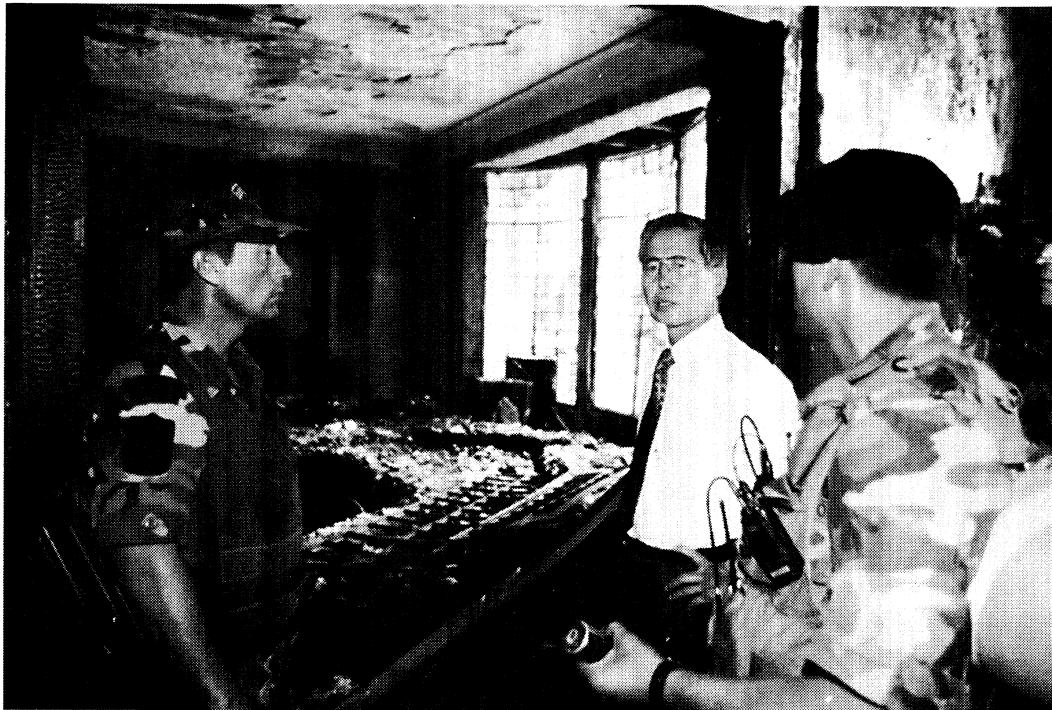
美國外交政策錯在何處

帕特裏奧·卡思特羅：拉魯旭博士，我很高興再次聽到你的講演，我很高興地看到你仍然是這樣健康和思維靈敏，我認為你所講的對今天的美國來講，都很重要，肯定對西半球很重要，對今後的美國與美洲國家的關係很重要。我最關注的是你的這些思想如何能在美國總統競選過程中體現出來。你的思想不僅具有學術性，你是美國總統競選的前候選人。我一直在拜讀着你的組織（指席勒學會）所發行的刊物。你的競選委員會今年 1 月 24 日發表一篇措辭強烈的聲明。文中指出美國政治制度正設法破壞，阻擾你的競選活動。他們已經把美國的選舉變成了踐踏全球公認的自由和公正選舉原則的一場鬧劇。有關美國政客們是如何污辱美國原則的經過，你們的文章報導得很詳細和充份。

拉魯旭先生，你知道，離秘魯總統大選祇有 6 周了。美國的許多機構都來到秘魯觀察秘魯現狀和監督選舉結果。美國全國民主研究所，卡特中心，共和黨國際研究所，華盛頓的拉丁美洲事務機構等等都對秘魯的制度予以尖銳的批評。我所要指出的問題是：“這些機構表現出非常關心秘魯的選舉情況。他們對美國選舉的合法性是否也如此的關心呢？關於你參加競選的問題這些機構是不是也在幫助保證你所參加的競選是自由、公平和符合國際標準呢？這些打着在秘魯推行民主制度的機構在美國却在幹什麼？請你回答。謝謝。

拉魯旭：我可以給你舉一個例子。這些機構或組織都是與所謂的民主進步同盟或者全國促進民主聯盟聯繫在一起的。共和黨國際研究所與民主黨的機構也是同一貨色。我已經認識這些組織很長時間了。他們不是我所欣賞和推薦的人。例如，正是這群人在努力把南美販毒的活動合法化。他們已經在哥倫比亞開始活動了。現在又盯上了秘魯。他們還想在厄瓜多爾進行同樣的活動。由於厄瓜多爾與亞馬遜河交界，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因此想把厄瓜多爾變成西半球生產和販賣毒品的基地和轉運中心。美國的這些機構不喜歡秘魯，因為秘魯長期以來一直成功地與叛亂分子做鬥爭，并且很成功。我認為目前的總統面對外部壓力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堅持正義。今天，任何主張把販毒合法化的人都是與美國卡特中心等組織有關。這不僅對美洲國家有害，也有損美國本身的形像。他們的所作所為就象是 19 世紀地大英帝國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損害中國利益一樣。事實上，英國首相帕莫斯頓象中國宣戰，并向中國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中國政府把販賣鴉片合法化。

今天美洲國家所面臨的壓力和當年的中國很相似。來自外部的壓力就是想要拉美國的政府屈服它們。但是像秘魯政府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能完全消除外來威脅的話，至少可以控制國內的局勢。你可以把今天秘魯的形勢與哥倫比亞的形勢相比較，在那裏，我們的一些當地朋友也有你類似的想法。但是，哥倫比亞沒有能力相秘魯那樣捍衛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不能容忍秘魯。道理就如此簡單。



營救日本住秘魯大使館的人質行動成功之後秘魯總統藤森于1997年4月23日視察日本外交官宅。

但是，要想對整個局勢有更深刻的理解，人們必須懂得美國到底是什麼。美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自由的聖殿和人類希望的燈塔。美國是第一個成功的民族國家。從憲法上講，美國是至力于在尊重政府權力的原則上建立一個人享有充份權力的國家。美洲國家深受美國民主原則和精神的鼓舞；而早年的美國也總是關心其美洲共和國的兄弟們應該享有主權國家的一切權利。

但是在美國這塊神聖的土地上，也存在着這樣一群人。他們身系倫敦，以紐約銀行家為代表的這群人有着背叛美國主權的不良紀錄。曾經擔任過美國副總統和曼哈頓銀行的創始人阿龍·巴爾(Aaron Burr)和其他許多南方奴隸主們。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他們已經繼承了出賣美國利益的傳統，他們是一群賣國分子。

我在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我的事業目標就是站出來大聲疾呼，為我所信仰的美國民主原則和理想而奮鬥。另一方面，就向美國歷史上的幾位偉大總統一樣（例如：林肯，昆西·亞當斯，門羅，羅斯福和肯尼迪），我堅決主張美國應該堅持全民福利的原則。我們的力量來自於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應該代表全民的利益，對外，我們要和西半球的

其他主權國家聯合起來，在相互尊敬和友好的基礎上，發展和推動全民普遍福利的理念。

但是，這些人並不希望如此。他們懷着不現實的想法并想把這種想法強加于世界。他們欲要解體現存的美洲各國。他們所要攻擊的目標是美洲國家的軍事部門。然後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的用各種顛覆手段來肢解美洲國家。他們的活動得到了販毒集團的協助與合作。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在美國的確有一些人包括前總統卡特等，他們都有些腐敗。他們根本不喜歡目前存在美洲的單一民族國家。他們隨意批評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他們想要摧毀任何形式的主權國家的政府。他們甚至反對向秘魯政府對販毒活動進行無情的鬥爭。我們必須站起來，團結全世界的人民一道站立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維護國家主權。

保衛國家主權

路易斯·米迪納：拉魯旭先生你好，我很高幸看到你如此健康，今天整個會場幾乎座無虛席。關於目前秘魯的局勢，我個人的觀點認為已經嚴重。目前，泡沫經濟的危害還沒有出現，但是我們的確往那個方向越陷越深。我想請你就當前的經濟問

題發表一下你的觀點，我們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改革？

藤森總統一直幹得不錯。他的反顛覆和反販毒成就已經獲得國內外人承可。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藤森總統得民心的基礎之一。但是在經濟問題上，藤森總統却采納的是一條自由經濟政策。但是事實上，像秘魯這樣的國家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熱潮衝擊下，失去的東西比得到的會更多。更為嚴峻的是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毫無疑問地會在全球範圍內崩潰。卡迪薩斯所做所為就是承認這種嚴峻的形勢。也許幾個月內或及周內。它對我們的經濟制度的影響以及政治與社會的影響都會表現出來。

如果藤森再次當選為秘魯總統，我們將很有可能擁有一個政府採取一條務實的政策。特別是當世界泛圍內發生嚴峻的形勢時，我們的政府能夠抵擋住外部的壓力。但是我也想，我們過去失去了許多時間。目前我們到底有無機會防上國際危機突變，我們應該怎樣採取具體步驟嚴陣以待。在這種情況下，就短期而言，秘魯和其他國家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政策來處理目前的局勢發生巨變。

拉魯旭：我們實際上是處于一個非常危險的國際局勢下。在目前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象對待戰爭一樣的嚴肅。如果你連你自己的情況都不能控制，你也就談不上解決任何問題。這樣的話，第一條防線，即經濟防線，以及任何其他防線都必須要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和對領土完整的原則。實際上領土完整本身也是國家主權的延伸。如果這第一條防線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都難以維護，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目前我認為藤森總統所做的一切都是集中于政治戰線上。卡特及其代表所攻擊藤森的理由就是在這點上。從國家政治完整的角度上講，藤森總統堅持國家主權必須得到捍衛，國家內部事務不容外人幹涉。但問題是：作為國家元首藤森和他的人民是否有勇氣去面對外來的凶悍勢力，起來捍衛他們的國家。我個人認為秘魯捍衛的是國家主權，秘魯人民有權力決定其自己的經濟事務。但是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最骯髒和最卑鄙的國際反人權組織，他們打着維護人權的旗號，而攻擊的恰恰是弱小國家的人權。我把這些人稱之為“新鴉片戰爭

政策的執行者”。這些人來勢凶凶，踐踏各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他們要執行的是他們制定的所謂國際法準則。

我想我們祇有很短的時間來談論采用什麼措施了。我想暫時的措施也就是國家保衛措施。一個國家的人民與其政府的意志將得到考驗。他們是否能夠保衛其主權及其領土完整。此外，我們還要看一個政府是否真正有決心保衛主權和其人民的利益。如果外來勢力幹涉我們內政，要求我們由於某種經濟或金融條件，必須犧牲人民的利益，我們的國家是否能夠挺而捍衛自己人民的福利。這將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就國際政治而言，每一各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的。秘魯的事情會被其他國家所關注。如果一個國家的力量不是強大到足以保衛自己，他必須尋找國際盟友形成聯合陣線。

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說明兩點。首先，我們現在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已經沒有任何的前景，我們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裏採取任何手段保衛我們的主權。我們必須期待着新的變革。我們還必須考慮和設想具體措施以應付突然事件的發生。例如，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教育。開發個人的智力和培養人的綜合能力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基礎。此外，家庭的健康和福利也是經濟發展的保證。總之，教育發展計劃，技術培訓計劃，全國糧食自給自足計劃以及基礎設施發展計劃，所有這些都是與經濟發展分不開的。

目前，我們正處于十分嚴峻的形勢之下，我們的資源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們必須十分清楚我們到底想做什麼。一旦我們有條件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同時，還必須頭腦清楚究竟選擇一個什麼樣的政策，要面向未來。

就秘魯情況而言，我想我的主張是先解決水的問題，也就事解決人民飲用水，工農業用水等等問題。我們的規劃應該是有長遠性，調查一下我們到底能幹什麼。我相信我們在秘魯存在着很好的機會。藤森總統也一定會改變其主張或看法，以更有效的方法去解決秘魯的實際問題。

但是，在實際情況中，我認為外部的壓力還來自于所謂的人權組織，例如卡特中心，以及經濟合

金融方面的，他們打着關心人權和主張全球化的旗號，粗暴地幹涉別國內政，侵犯主權國家的利益。我的觀點與秘魯的政策是一致的，與美洲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都決心保衛國家利益，反對外來幹涉。我想你們一定都知道我的長遠主張是什麼？目前，擺在秘魯和其他國家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衛國家主權，尋找機會，利用自己有限的資源去最有效地打擊我們共同的敵人。

關於國際貿易政策問題

裏茲·彼裏斯：拉魯旭博士，你已經非常清楚地解釋了我們祇有從根本上提高生產，我們才能有力量。我對這個觀點很感興趣。考慮到你曾預言世界總危機將到來，我有二個問題需要你解答。第一個問題是。早在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各國，特別是秘魯都應用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的主張，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實行內行型的經濟發展改革。如果我們在按照你所說的那樣，大力鼓勵發展生產，特別是我們在農業，采礦和其他產業方面，我們必須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分享這些產品，其中全世界各國都尋找的一個最大的市場就是美國。

如果你成為美國總統，你的貿易政策將是什麼樣的，我們特別想知道你對拉美國家，特別是秘魯的國際貿易政策是什麼？由於我們的許多產品需要得到配額才能進入美國市場，並且我們還要面對來自亞洲國家的激烈競爭。你曾經提到過，最好建立拉美國家或整個美洲內部優惠機制。因此，我想聽聽你對國際貿易政策的主張與見解。

林·拉魯旭：首先我贊成關稅保護政策。我們應該在我們的經濟結構內部制定好價格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保護生產力人員的生活水準，我們制定的價格還應鼓勵在生產技術上的投資。國與國之間可以在貿易和關稅問題上進行談判。目的是鼓勵這些產品出口和擴大生產。第一要做到制定一個最低價格標準；第二是價格要浮動。

讓我舉中國為例，目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已經成為全球的熱門話題。我認為中國的政策和美國的政策都是錯誤的！我想在中國肯定有不少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是在這裏我不會與他們去

爭論。中國目前的年平均增長率是 8%。我想這個估計是公平的。

但是這祇是毛增長率，而決非淨產值。由於中國的發達地區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地區，中國內地還有許多貧困地區和窮人。中國人民非常勤勞，考慮到他們的生產技術水平，中國的糧食生產是個奇迹。總之，中國人的效率是值得稱贊的，但是中國人民的總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

現在中國人的目標是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和提高中國的生產效率。因此，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依靠廉價勞動力去競爭。中國人不應該在世界市場上傾銷他們的廉價產品，中國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銷售廉價產品能力，而是積累資本的能力，中國人需要資本，他們需要資本去發展和建設一百多萬個新的城鎮。他們應該大力發展其落後的農村。所有這一切都是需要資本和技術。祇有這樣，中國才能繁榮。

印度也有相似的問題。它目前有 10 億人口，其人口的密度超過拉美各國。印度城市人口增長很快。近幾年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窮人也很多，窮富差距愈來愈大。所以問題仍是資本從那裏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水利工程，發電站等都需要資本。秘魯也是同樣，它需要大批的資本來提高生產能力。

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述，我認為我們所必須的是建立一個新的貨幣體系。考慮到國際勞動力分工的問題，這個新的貨幣體系的職能 1 就是要讓世界高科技和資本集中的國家轉移一些技術和資本到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但是，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他們的貸款率非常在 1% 左右，時間為 5-30 年不等。為了擴大出口，我們必須要保持信貸的大幅度增加以取代目前的債務問題。我這裏要強調的是：對於那些急需資本和技術的國家，世界貨幣機構所提供的貸款必須是長期和低利息的。祇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能在世界範圍內提高產品的價格，防止用廉價產品來充斥國際市場。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的例子，那裏甚至是奴隸勞動。那些人生產的產品銷售到美國市場，可是他們的工資却不能養家糊口。我們必須反對產生廉價

勞動力的場所。因比，我的基本設想是、我們必須回到實物資本的概念，反對祇有貨幣資本。

我們必須在全球範圍內重新組織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生產關係，關稅關係，等等。如果必魯想要建立一個紡織工業，或擴大農業，我們必須制定貿易協議或關稅協議，保證信貸來源，提高生產力。此外，我們要加強科技知識的教育和培訓。這樣才能夠保證提供新一代領導人。

所以，我的總設想就是：要考慮道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勞動分工，或是合理的勞動分工；要有 30 年的長期發展規劃；要有合理的部門分工，市場分工和計劃分工。讓各國根據自己的條件行事。我們之間必須達成共識，在今後的 20 年到 30 年間產生出積極的結果。

南北美洲大陸對話的基礎

李克·卡斯特羅：大約在 40 年前。拉美的情況很相似您現在所解釋那樣。自從肯尼迪政府以來，我們與美國進行對話的想法趨于成為現實、進步同盟的出現，使得在拉美出現了一種主張南北美對話的趨勢。所以你們的保護主義政策與我們的保護主義政策可以相互協調達到對雙邊都有利的解決辦法。我清楚地記得在 60 年代，拉美國家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達成了共識，不久又出現與美國的對話。但是到了卡特時期，美國表示沒有必要與拉美國家保持對話。他們要與每一各單獨的拉美國家進行對話。

後來又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問題。眾所周知，市場宛如海洋，在那裏，大魚要吃掉小魚。這樣就使我們很困惑。我們不認為市場就是我們的解決方法，我們要求的是合理的解決方案。這樣，南北美洲國家之間的對話不復存在了。例如，美洲國家組織實際已經變成一個沒有用處的空殼。而美國對拉美各國的批評甚至是人權問題，而不是我們所關心和解決我們實際狀況的經濟與金融問題。因此，我們問題是，拉魯旭先生，根據你剛剛提到的思想，假如你成為美國總統，你認為美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對話的主題是什麼。我們應該具體做些什麼來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從而變得更“注意人權，和更理性。我們的確厭惡了美國政府以“人

權”警察的口吻每 6 個月就告訴我們如何如何？

林·拉魯旭：你的問題對我來講就象是一篇論文。首先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我們認為某些事情應該這樣。但是我們也有缺點，我們並非升治在天堂讓。因此：我們彼此之間應該容忍。

我們現在處在人類文明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時期。請允許我這樣表達：我們今天所面臨人類的普遍問題。人類有能力發現新的思想，發現人類普遍接受的原則。如果我們這些人類通過教育，通過家庭生活來吸收人類普遍的原則，我們就會變得更加聰明。

今天的美國已經走到了它注定滅亡的邊緣。由於一、二代領導人的愚昧，我們才走到了今天的這個地步。我們必須找到能夠領導我們走出絕境的領導人。我們仍然有幸我們目前就有這樣的領袖人物。

我們這些人已經老了並且有着豐富的想像。要懂得我們的問題不是單純的金融問題，不是孤立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像古羅馬帝國一樣，本地球上的各國人民祇知道縱情享受，根本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他們到底怎麼樣了。因此，我們這些長者必須教育年輕人，特別是 25 歲以下的輕年人。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喚醒中年人並教育他們，激發他們。我想這就事我們的任務所在，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形勢。

正如我前所指出的，我們將面臨一場可怕的危機，即這一危機恰恰是二代人，特別是二代領導人所遭成的。但是我們還是有希望去擺脫這一危機，喚起廣大人民接受我們的思想。我的希望是我們最終能擺脫危機。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形勢。

我之所以持這種觀點，是因為我本人經歷了許多事情。我是一個老人，我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走過了經濟大蕭條時代。我親眼目睹了 50-60 年代的縱會進步與變化，我可以肯定的說，至到 70 年代。雖然當時的政策遠遠不能說是完善，也存在着不公平和各種缺陷，但是它還是積極的。在過去的 30 年裏一直占主導地位。因此，我希望，

我們不僅能夠克服困難，我們更應該學會吸取歷史上的各種經驗教訓。讓我們共同努力走出目前的危機。

徹底改變教育質量下降的問疑

維思吉思·米迪納：你剛才講得很深刻也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有文化和精神原因。秘魯作為第三世界面臨着許多文化問題。在我們秘魯所流行的美國文化影響實質上是反映了美國文化的墮落方面。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加強教育。

我們秘魯有許多教育上的缺陷。長期以來。我們沒有一個總的發展規劃，政府方面也下功夫不夠。很明顯我們需要很多新的思想。我們急需提高教育質量，文化素質和提高人類精神文明。



秘路近鄰，玻利瓦爾實行的識字計劃。

我想知道你的教育思想是什麼，具體地講，你是怎樣看待如何教育年輕人這個問題的，你所主張的方法是什麼，就高新科技而言，我們應該怎樣着手解決？

林·拉魯旭：我曾在秘魯住過一段時間。這個國家有許多山巒。因此孩子們晚上可以出去觀察天文，聽歷史課。當然這是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我們的問題是我們如今太過份地依賴于電視來學到知識。孩子們祇懂得如何記住他們叢書本上或黑板上所學到的東西。我們忽視對他們智力的開發。實際上，人類有能力發現物理原理。如果孩子們祇是根據書本知識來滿足自己，而不重視社會實踐和觀察，那麼，年輕人的成長是有問題的，

讓我舉藝術為例，根據我的個人經驗，如果把孩子帶去欣賞繪畫，揣摩繪畫的手法等，孩子們的視界會立刻擴大。他們會認識到藝術的普遍原則。同樣，欣賞著名古典音樂也會收到類似的效果。

所以我們的確需要精神上的教育。強調提高人的素質。這是人類與動物區別的根本差异。現在某些動物也可以學會東西，但是沒有任何動物可以觀察並發現普遍的物理原理和藝術原理。正是人類的這一素質才分開了人類與動物。因此，我們培養的孩子不僅要有知識，更要具備素質和能力。我認為這是普遍教育政策的根本原則。

這是我們從道德上和智力上重建一個理想，社會的根本性基礎。

特拉吉羅·梅亞：拉魯旭先生，晚上好，作為秘魯國家公共財政學院的院長。我想代表全體師生，董事會，財經委的全體人員以及我本人向你表示感謝、你的講演非常出色，你始終堅持你的理念，忘我的去奮鬥。每當我看到你的文章時，我認為從政治上講你是美國民主黨派中的激進的革命家。作為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應該聽聽你的意見以便改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拉美國家的政策。

再次代表全體與會者，十分感謝你的參加和精采的演講。你的立場很吸引我們，對第三世界國家是有益的。我們希望你能當選美國總統，把你的理想變成現實。我們會從中受益。我們的大會很成功、我感謝全體與會者。再次感謝拉魯旭先生。我邀請全體與會者懷着感激的心情向你說晚安。

中國需要保護主義和 弗·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理論

田約森 博士

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

韓德強

經濟管理出版社

隨着 1999 年 11 月的美中貿易談判出現“突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前景更加明朗，因此緩解了兩國就國家經濟和對外政策整個未來發展方向問題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對立。這次談判不僅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也直接涉及到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普遍的問題：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作為促進人類進步必不可少的因素將如何生存？或者說實行寡頭政治的統治者是否會試圖壓迫民族國家，并以“自由貿易全球化”為名強行在世界範圍內推行帝國主義體制，把人類帶入新的黑暗時代？到目前為止中國仍保持着極大的經濟自主權和獨立性；然而其他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一直陷入由倫敦和華爾街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以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束縛之中。圍繞着加入 WTO 問題中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表明它的形勢已發展到嚴重關頭。

在中國內部討論中有一種極端的觀點，贊成對中國經濟進行激進的自由化“電休克療法”。他們把加入 WTO 看作是掃除 1979 年以前占主導地位的“計劃經濟”的遺留問題，迫使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停業，使中國迅速納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場經濟的重要途徑。

另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觀點則指責，與美國簽署加入 WTO 協議是“賣國”行為。“賣國”一詞立即勾起了對耻辱的“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回憶——從 1842 年起，腐敗無能的中國清政府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簽定條約，打開中國大門任那些列強肆意掠奪，由此使中國陷入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狀態。從這些民族主義批評者的觀點來看，與美國簽定 WTO 協議意味着放棄中國的主權，并向那些正試圖通過使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各種壓力分裂和摧毀中國的勢力敞開大門。他們警告說，WTO 協議所要求的關稅進一步降低以及其他自由主義化措施將使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受到嚴重打擊，制造一場波及千百萬人的社會危機并最終使外國資本從根本上取代中國經濟。

在就加入 WTO（其前身是“關稅貿易總協定”）進行的將近 15 年的談判期間，中國政府一直試圖保持中間立場。一方面，中國政府堅持認為加入 WTO 是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進程”的，對擴大中國貿易和對外投資提供新的機會，同時通過外部競爭的加強，促進中國企業的改革并使之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與美國及其他國家談判中提出，中國加入全球經濟必須循序漸進，必須考慮到中國的重要利益和“具體條件”。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對國內經濟實施極大的幹預——與自由市場理論相對立。例如，通過控制手段把資源用在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上。中國主席江澤民

反復強調說目前的全球化形式——以“不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為內容的——已經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中國家引起巨大的痛苦。因而中國政府對建立一個新的、公正和公平的經濟及金融體制的主張給予了表面的支持。盡管如此，在此同時江明確提出全球化是“客觀歷史趨勢”，中國不能與之背離。現在，在11月美中貿易談判出現“突破”後，加入WTO已為時不遠，為此中國就進一步實現貿易自由將會產生消極影響的爭論業已達到高潮。

這裏且不深入探討協議的具體規定，總的說來，它規定大幅度削減中國保護性的農業和工業關稅，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要向外國銀行、保險公司，還有電信及其他戰略性領域開放中國的市場。雖然這些措施並不立即生效，但是隨着中國加入WTO，在若幹年內它們將快速生效，這意味着中國自1949年近半個世紀以來實行的強大的保護主義的、以民族經濟占主導的經濟政策將出現最後的、決定性的突破。

此時，有一點還說不準，即中國為了實現經濟自由化作出痛苦且充滿危險的讓步之後就真的能換來公平的機會接觸各種可以促進使之未來經濟發展產生質變的先進的西方技術。相反，美國繼續嚴格控制對中國機床和其他先進技術的出口，同時美中在航天航空及其他高科技領域的共同合作項目也由於美國國會反華派的大肆反對而陷于癱瘓，甚至被取消。

去年本作者在訪問中國期間，經常向中國學者和官員提出這樣的問題：“鑑於進一步減少關稅保護及其他經濟自由化措施將給中國造成巨大內部困難，為什麼你們那未急于加入WTO？”我從未得到一個真正令人滿意的答案。除了回答中央政府已作出中國必須加入WTO的決策這一事實之外，我得到的答案基本是政治上的原因：加入WTO意味着最終結束中國數十年來與“國際社會”痛苦的隔離。WTO是目前唯一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却還不是它的成員國，因此很多中國人把長期不能加入WTO——原因在於美國貿易談判者提出了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看成是被打了一記耳光，是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蔑視。



50年代，蘇聯專家與中國工程師討論機械技術問題。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國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地，生產各種機械設備。

這些看法從主觀上講或許很有道理，但它們無法證明對中國國內穩定會產生災難性影響的這些決策是正確的。顯然，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同美國達成的協議是一項“糟糕的妥協”。

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壓力是由美國——包括沒腦筋的克林頓總統本人——施加的。克林頓總統將中國加入WTO看作是他的對華政策的最大成就。渴望與美國保持良好的，起碼是過得去的關係的中國政府面臨着兩難選擇：一方面，在中國公開的敵人（以美國國會中的所謂的臺灣利益集團為代表）控制着美國政策的條件下，中國面臨着同美國發生直接衝突甚至可能發生一場戰爭。克林頓和其他一些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朋友的人一直強調要將經濟自由化當作中美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但這項政策注定會使中國政治和經濟混亂不堪。

除了受到來自美國和英國控制的歐盟的壓力之外，人們不能忽視中國內部還存在着一個強大的“自由貿易”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集中在以出口為導向的沿海省份以及有影響的香港和海外金融勢力中（英國通過前殖民地和“自由貿易”天堂香港所施加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此外，福

特基金會、世界銀行以及其他一些西方金融機構已經成功地感化了年輕一代的中國經濟學家。因此，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在中國學術界、新興的私營企業界和大陸的財政界中有着非常大的影響，這些人渴望擁有他們的新加坡、香港和西方的同行們所擁有的財富。在這些人看來，國家和世界經濟的自由化，直至實行毫無限制的自由貿易是自然而然的事，這一進程是不可阻擋的。他們認為像1979年以前實行的高度民主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是可耻的，是落後的象徵，忘得越快越好。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中國人非常幼稚地冒着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危險，就像在東歐和前蘇聯發生過的一樣。

面對這種進退兩難的窘境，林登·拉魯什提出了唯一可行的綜合解決辦法：美國從根本上改變政策，支持發展民族經濟的保護主義政策，建立維護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新布雷頓森林”組織，在建設歐亞大陸橋和其他大規模基礎建設方面進行合作。出于這一原因，不管當事各方是否承認，中美關係的命運——至少是中美關係比較積極的方面——是和拉魯什的政治命運以及他在美國開展的運動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反對“全球化”的活動明顯增強。最近，書籍和文章以西方人認為是典型的仇外和毛主義辯術的形式在中國紛紛出現。這些文章和書籍關注于一個事實，即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發展成經濟強國的原因可能在於保護主義的治國方略，而這同目前人們祈求的“全球化自由貿易”政策是“截然相反的”。面對“全球化”，愛國的中國學者在探求維護中國主權和獨立的過程中，轉而關注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和19世紀倡導保護民族經濟的“美國制度”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

這種傾向的突出表現是今年年初在中國出版的一部名為《衝突！全球化陷阱和中國的現實選擇》的著作。作者韓德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家，他從“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威脅以及支持全球化和中國加入WTO的中外“權威人士”的理論觀點這兩方面對“全球化自由貿易”進行了猛烈抨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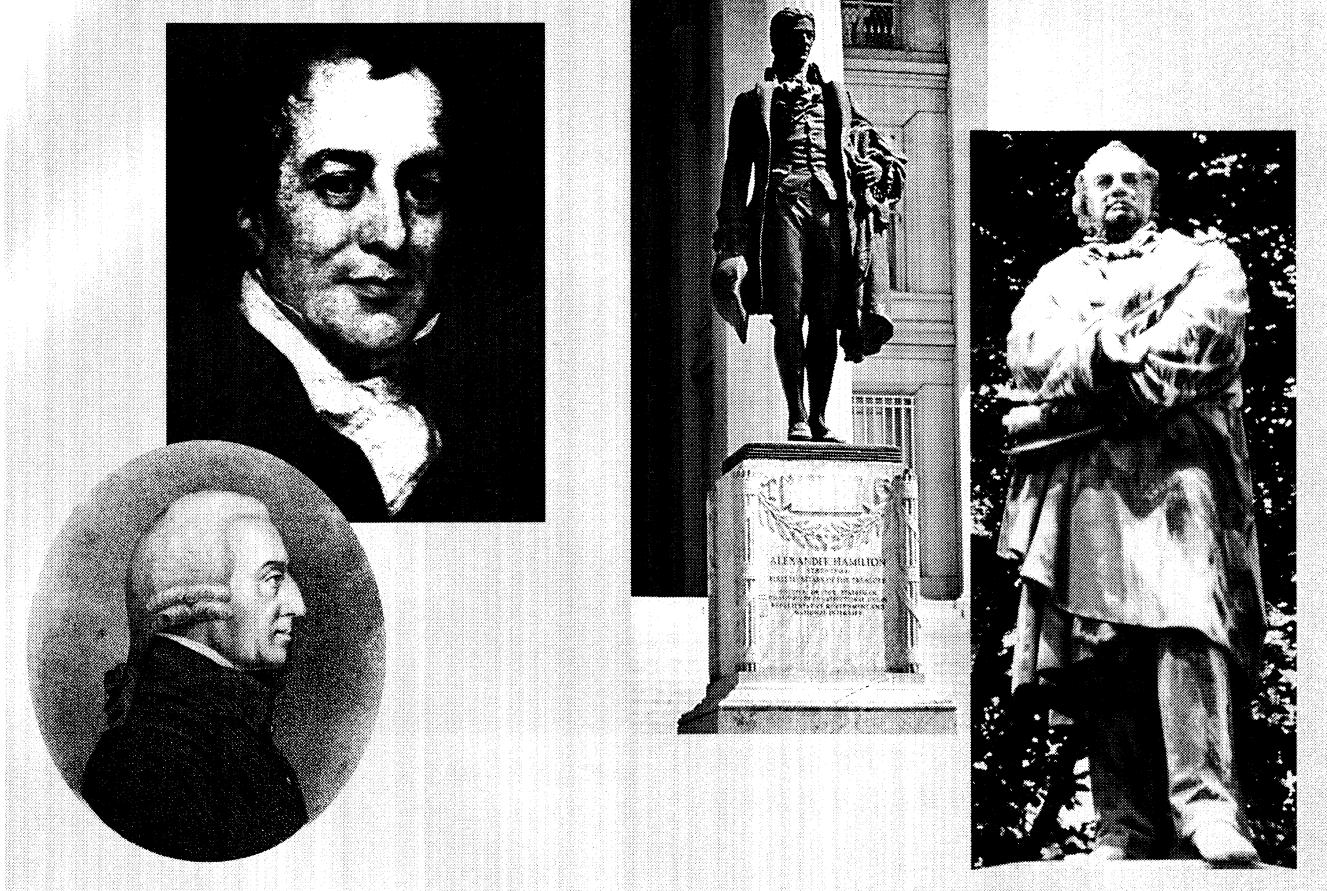
作為一名中國的愛國者，韓的美國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為中國人民天真的親美情緒對他的國家是致命的威脅。中國人的親美情緒並非出于真實的了解，而是出于對假想的“自由市場”奇迹的迷戀。與此同時，韓認為中國人應該從19世紀美國的反英鬥爭中吸取經驗。這是本書的中心思想。韓強調，那場鬥爭的核心是以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為代表的英國自由貿易主義同漢米爾頓和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倡導的保護民族經濟制度之間的論爭。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利用李斯特和美國歷史來駁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他們的當代辯護士——如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克魯格曼——的謬論。

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呼籲將最初的美國經濟原則應用到中國。但他的論點的意義不僅限于此。據韓所說，世界目前正處于一場新的“大蕭條”的邊緣。世界金融市場的巨大泡沫的破滅將導致目前占壓倒優勢的自由貿易思想走向終結，并使世界範圍內的保護主義政策迅速出現“高潮”。韓德強的書不僅會使中國讀者，而且會使不太容易見到這類讀物的世界上的讀者感興趣。下面我們將列出書中的主要觀點及中文原文的某些節選，此外我還會作出評論和解釋。

中國陷入陷阱了嗎？

韓德強在書的開頭描述了“市場浪漫主義”在中國的蔓延，指責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和大眾媒體在公眾中傳播對加入WTO後確實可能發生的事情的錯誤的期待。韓引用了那些描述加入WTO後將如何“使每一個消費者變成上帝”的“廣闊前景”的典型文章：除了看到外國產品的機會多了以外，中國公眾被告知加入WTO後，由於中國生產者被迫彼此競爭并在國內市場上同外國生產者進行競爭，商品的價格將降低而質量却提高。“落後的保護主義”一旦被取消，中國家庭將在消費商品中享有更大的選擇、更低的價格以及更佳的服務。

“這或許全是真的，而且可能在加入WTO後很快成為現實”，韓對中國讀者說，“但是此時你却沒有被告知中國人民將如何謀生。”韓說道，中



(左下圖)本文作者韓德強向人們揭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以及“市場浪漫學說”將對中國所構成的威脅。(右起第二)韓德強也告訴大家，漢密爾頓(Hamilton)和李斯特(List右圖)，的經濟理論和使美國強大的美國體系的經濟學家才應是中國目前發展的樣板。

國的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如果他們失去了工作，他們怎麼能買WTO的倡導者正在向他們承諾的廉價商品呢？

譬如：“隨着美國的小麥、大豆、棉花、牛肉、鷄等進入國內市場，9億中國農業人口將遭受極大的痛苦。”事實上，在同美國，還有其他地區進口的廉價食品進行所謂的“自由競爭”的情況下，中國農民將毫無希望的處于劣勢。中國人均可耕地數量和土地肥沃、能源便宜的美國相比，名次差得很遠。中國農業平均技術水平大大地落後于美國因此產品價格極高。在中國，由於很多農民仍然在小塊的土地上耕作，所以以農業為生的狀況依然很普遍。大約全部農產品中祇有35%是通過市場進行分配的，所以大部分農村還完全不熟悉現代

化的市場環境。在中國的不同地區之間，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都存在很大差異，由此產生農產品價格的巨大懸殊。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農業怎麼抵禦美國及其他外國食品進口的猛烈衝擊？如果沒有政府幹預保護國內生產者並對地區差別提供補償的話，那麼無數的中國農業人口將可能丟掉生計，被迫進入城市尋找工作。

但是，如果外國製造業如洪水一般涌入中國市場，中國城市的情況又將如何呢？韓不同意某些中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認為在加入WTO後中國工業能迅速做好準備，迎接殘酷的國際競爭——過于自信的觀點：“盡管中國金融、保險、汽車製造、通訊、化工、紡織及農業(的競爭力)仍然十分薄弱，盡管這些部門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基礎，而且它

們完全可能被外國公司控制，但是中國仍昏了頭要加入自由市場的競爭，稱其為一項充滿激情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

中國的汽車製造業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它掌握在一些在今後外國公司參與進來的、開放的市場中可能沒有生存機會的小生產商手中。“就算擁有 100 多家汽車生產廠家的中國汽車製造業效率低下，但是不要忘記這些企業具有提供就業的作用，”韓寫道，“問題是，誰將取代它們？是出現國內大型汽車製造集團呢，還是整個國內汽車業全部垮下來？所有的對機器、發電設備等等的訂單——它們仍會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作為汽車工業的發展基礎，并使之成為經濟的‘支柱產業’——將會帶來什麼呢？”

韓專門對中國工業各部門逐一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指出汽車工業——通常被認為是加入 WTO 後“損失最大的”部門之一的形勢決不是一個例外。就幾乎全部重要的工業部門來說，中國國內生產者的競爭潛力是極為脆弱的。把中國國內市場納入“世界市場競爭”中意味着國內生產商將全部覆滅。

事實上，根據 WTO 協議規定中國仍將被允許一定程度的保護主義政策——雖然被較大程度地減少——特別是在初期過渡階段。但是，即使限制了降低關稅并採取了其他的保護形式——在最近 10 年間完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也已經導致對中國國內生產商的極大削弱，而且使得很多國內市場被外國資本“搶占”。

有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無酒精飲料，美國的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兩大公司，通過合資經營，并利用其巨大的技術優勢、市場營銷攻勢以及壓倒一切的資金力量，現在控制了中國 90% 的市場。目前，國內全國性的大生產集團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和“兩個可樂公司”一起合資經營，或者倒閉。

從戰略的觀點來看，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機床和工業設備制造部門正面臨着嚴峻形勢。韓強調指出，這些部門是任何民族工業的基礎核心。他詰問：“如果要進口紡織機械的話，那麼中國作為紡織和服裝的生產大國，其價值記號呢？如果要進口生產線，那麼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電視生產者的利益



洪都拉斯的一個工人。自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以來，在短短的二年內，墨西哥就產生了 200 萬炎去者。

何在呢？如果要進口發電設備，那麼對於中國來說，生產與歐洲和美國同樣多的電有何用呢？”

中國老一代領導人曾密切關注機床及相關部門的建設；但是，由於中國關鍵性的資本物資部門不得不從頭建設，所以和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這些部門還仍然落後。隨着開放政策的實施，進口的機床和工業設備流入中國，1990 年至 1996 年期間，中國工業每年共有 2/3 的開支用于購買資本設備。由於對國內生產的工業設備定貨減少，其利潤額大幅度下降。國內生產商面對利潤降低和短期困難增加，幾乎很難維持進行與國際技術水平同步所必須的研究和開發活動。結果，很多的中國戰略性工業部門——實際上以前完全是由國內資本物資部門支持的——便嚴重依賴外國設備的進口。例如——根據韓引用的數字——中國石油化工現在有 80% 依靠外國設備；國內市場上的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機械以及其他高科技機器設備有 70% 或者更多是從外國進口的。

為了使讀者了解有關中國經濟政策的爭論，韓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駁論。有些極為相似的情況——韓引此說明中國國內的生產者行將倒閉，却可能被很多支持自由化改革的人當作相反的論據：從表面上看，通過合資和其他合作方式利用外資、引進高科技並學習技能的戰略——為了促使中國經濟實現現代化——已取得顯著成績！這一似是而非的情況需要簡單解釋一下。

在過去的 20 年中，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能對中國工業產量迅速增長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促進了很多產品的質量。（參見 EIR1998 年 6 月 9 日刊“你應該對中國經濟有哪些了解”）一般說來，這些也是真實的，中國比幾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更好地利用了外資。

但另一方面，不難看出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表面上成功的背後存在着危險的片面性。它所表現的迹象是大量的進口依賴於中國的出口。據統計，從中國出口的產品中，其中進口的成分平均構成出口價值的 60%。換句話說，為了生產價值 1000 美元的出口產品，中國必須進口 600 美元的設備、食品半成品或原材料！就很多的出口產品而言，相對來說，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及低技術含量的機械製造企業大多在中國，而真正項目和生產設備則從國外進口。雖然大部分的外國投資——特別是歐洲、日本及美國的投資——已被用到建設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的工業企業上了，但是，這些企業典型的特點是裝備了全部進口的高科技專業生產線，而國內市場沒有相同的設備。這些先進的生產技術大部分仍基本控制在外商手中，而且，為了保證生產還必須進口大量的零部件和置換設備。

人們可能要說——或許有些誇張——過去的 20 年裏，由外資支持的中國工業的激增速度就像雨林的生長一樣：以極快的速度生長在相對薄弱的“地表層”，但缺乏深植于地下的根基，這是限制其發展的主要因素。缺乏“深厚的根基”造成了中國自己的資本貨物生產部門以及使之充滿活力的國內科學研究與發展的欠缺。

作者認為，中國進口大量高科技含量的資本貨物——支持中國工業和基礎建設的現代化——本身並沒有什麼錯，祇要這種進口是有組織的並嚴格按照自然法則進行管理。最先應該做到的是要加強中

國自己的資本貨物生產部門，而不是削弱之。目標應該是發展中國自身“全方位”的科學工業的能力：創造新的科學發明的能力；把這些發明轉變為新技術門類（特別是通過新型的機械及相關的設計）的能力；促使新技術有效地變成整個經濟的發展基礎的能力。

要實現這些，需要在較高的程度上實行統制主義和保護主義，而在自由貿易的政策下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否則，進口帶來的影響一定是相反的，也就是說，它將破壞甚至阻礙“全方位”的民族科學和工業能力的有機發展，對中國長遠的未來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不幸的是，作者在中國的考察和韓的警告是一致的，即，後一種情況實際上正在發生着。韓認為其主要責任在於一些錯誤經濟理論造成的影響，諸如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後來被克魯格曼這樣的“國際權威人士”加以引深，而且不幸的是這些理論已經影響着中國的決策過程。

就業問題

在轉到這個重要問題之前，韓強調指出了外國投資模式、國有企業的困難和正對中國進行着不斷打擊的失業危機之間的關係：

“重要的是要注意，雖然 90 年代出現了國內生產總值迅速增長，但是這並沒有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很多人都已注意到這一矛盾現象：為什麼宏觀經濟形勢挺好，而微觀經濟形勢却糟糕？... 結果，有人懷疑官方提供的數字是不是可靠。但是，這可以直接從外國投資的後果來理解...90 年代，有 500 家大跨國公司以其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投資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到 1996 年時有外資的公司控制、甚至壟斷了一些部門...當然，外國投資的公司提供了某些就業機會，但是由於它們是高度的資本密集型企業，所以祇能減少當地的就業，而不可能增加中國工人工作機會。”

韓認為，合資企業實際上取代了國內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的生產商，減少的工作機會比創造的就業機會要多得多。同時，外國資本的涌入也造成了信貸流動結構的極大混亂：

“不幸的是，1992 年後，吸引外資狂熱起來，每個部門都敞開大門對外國投資提供優惠待遇。祇有得到投資款的人才被視為成功者。這種瘋狂導致了資本的巨大浪費 … 對於政府和媒體來講，跨國公司投資或進入中國的總數成了衡量開放政策成功的標準。”

根據韓的觀點，這種引進外資的瘋狂，以及競爭的急劇加強，是造成國有工業危機—包括給中國銀行體系造成災難的、著名的“三角債”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愈加艱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生存戰中，國有企業已經陷入產品價格緊縮大戰、失業以及債務膨脹的循環中。

隨着加入 WTO，在外國資本和外國商品的壓力下，傳統的國內企業的倒閉將進一步加劇。韓指出：“如果我們不能看到這一現實，而認為中國企業已經做好了準備，有能力去拼殺，并且能一下子跳到‘全球化’的中心去，那我們肯定將是死路一條。”

韓繼續說道：“這不是無所根據的理論，具體發生在世界很多國家的事實。在 1995 年墨西哥加入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前，墨西哥公眾不僅認為墨西哥人能夠很便宜地收購美元，而且墨西哥的商品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北美市場，這將會增加就業機會。然而，墨西哥人錯了；到 1996 年，墨西哥失業率達到 49%，兩年裏多了 200 萬失業人口。而且，這兩年正是倫頓《財經時代》稱之為‘經濟迅速恢復時期’。為什麼會這樣呢？真正的原因極為簡單：墨西哥紡織出口增加很快，而美國的跨國公司排擠并摧毀墨西哥的公司 … 致使新失業的人數大大超過新就業的人數。由於出現失業大軍，墨西哥及外國公司祇能拖延工資，因此墨西哥工人生活水平極大地下降。有比較便宜的商品，但他們口袋裏却沒有錢。”

“實際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往事。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和國民黨簽定了《友好貿易條約》…乍一看這是一個友好、平等的協定，幫助中國融入世界市場。但事實上競爭雙方沒有可比性 … 祇有或低於國內價格 1/3 的美國商品進入了中國，中國民族生產商一個接一個地倒閉。從 1946 年下半年到 1947 年，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城市的 27000 多家工廠紛紛關閉，到 1948

年初天津關閉的工廠達 70~80%… 這一《友好貿易協定》加劇了國民黨政府的垮臺。”

人們希望華盛頓還有其他國家的人能夠適當地吸取歷史教訓！

不道德的“自由市場競爭”

“很多朋友問我：既然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這麼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考慮不加入 WTO 呢？是什麼原因使得新聞媒體和中國學者，甚至還有企業界人士，如此熱衷于加入 WTO 呢？這確實也是我總在問自己的問題。”

韓提出了一個在中國的愛國者中普遍存在的疑問，即熱衷于自由貿易的新聞媒體和學者正在為跨國公司說話。然而，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真的，韓說，更為重要的是像亞當 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樣的自由經濟理論對人們的思想產生影響。

韓就此作了一個尖銳的比喻：“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是 … 為了侵略和瓜分中國，首先靠一種神秘的理論麻醉中國。實際上，公正地說，西方經濟學祇能麻醉神經中樞系統，而從中樞神經傳導到全身祇能通過某些中國經濟學家以及他們在大眾媒體的朋友作出努力。在這樣的自我麻醉中，行使權力者就成了外科醫生，而手術臺上的手術刀則是屠夫的屠刀。”

為了抵制這種“人工麻醉”，韓德強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剖析并批判他稱之為“相信市場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 … 市場浪漫主義”一對此，他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和大衛 李嘉圖。“市場浪漫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是把“自由市場競爭”實際上看成是促進經濟活動中一切良性發展的原動力，甚至作為一條基本的道德原則。

相反，韓却認為：“從根本上說經濟競爭是冷酷無情并具有兩面性。大型公司吞并數千個中小公司。但是，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和媒體却試圖把競爭當作‘真正的好事情’，（按照他們的意思）甚至對失敗者都有利。有些人甚至過分大膽和自信地提出無情地淘汰社會‘落後’部門的政策 … 其口號是‘落後的就應該被淘汰’。”

韓激烈地反對把達爾文主義思想如此這般地運用於經濟領域，他將此視為對文明自身的威脅：“‘淘汰落後’是動物界的法則，而不應該成為人類競爭的法則。難道我們不認為我們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嗎？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以人為本，尊重生命並以人類為榮，而不能以動物王國的‘弱肉強食’法則為榮。人們不能把運用‘弱肉強食’變成人類競爭的法律規則……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法則，那末何為公正，何為真理，何為人權，何為自由，何為文明？人類社會的歷史是文明與野蠻鬥爭的歷史，是真理與強權之間的較量，多數人的自由與少數人的自由之間的對抗。正是因為摒棄了‘弱肉強食’的原則，人類文明才得以進步。

“第二，‘任何落後的東西都應該被淘汰’的原則意味着人類生命和人的權利是有差別的。人們可能會把任何人看成是技術和社會‘進步的障礙’，這樣，消滅美國的印第安人，或者日本人消滅中國人——用‘先進的消滅落後的’邏輯解釋完全正確——就變成合法的了。

“第三，目前中國經濟同發達國家比確實是落後的。難道這就意味着中國國有工業該被取消嗎？假設中國多數的工業和農業是勞動密集性部門，缺乏技術，因此意味着它們全都應該被淘汰，而祇有外國跨國公司建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才能存在。那麼中國的獨立將失却，中國也將不復存在……

“中國的勞動人民——他們將要喪失工作或已經失業——應該將自己視為沒有希望的落後因素，把自己當成阻礙進步的絆腳石嗎？難道正處在‘落後的’詛咒聲中的人們應該從競爭中退却，任憑由跨國公司取而代之嗎？我們能接受我們自己被淘汰這樣的改革結果嗎？”

“不能！我們可能是落後的，但我們仍然是人，我們仍應生存，我們仍然希望由弱小變得強大。如果那些正在傳播‘自由競爭’理論的經濟學家使中國人感到50年的鬥爭歷史僅僅是落後的並且應該被淘汰，如果中國人民（自1949年）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進行的事業被看成是既得利益應被取消，那麼，我們的將來會怎樣呢？”

韓駁斥“自由競爭”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一與“看不見的手”的神話相反——沒有約束的競爭不可避免會導致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造成“一

種不斷戰爭——人與人相互爭鬥——的局面。雖然財富增加了，但是貧窮也增加了，戰爭的危險加劇，死亡懸于頭上。人類的競爭越發變成動物界‘每個人成為別人的野獸’的狀況。因此，所謂的‘看不見的手’事實上就是捍衛強權統治。為此，從根本上說，亞當·斯密創立的正統的西方經濟學不是科學，而祇是市場經濟的宗教。”

不幸的是，韓寫道：“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上已經把‘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競爭理論用到經濟結構的改革中……人們已經放鬆了對競爭理論的消極後果的警惕，忘記拉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弱勢地位。

“在過去的10年裏，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在中學和大學的課堂上接受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教育，他們受教育的結果是青睞自由競爭，戴着西方經濟學的有色眼鏡看世界。更為嚴重的是，國內政府也越來越多地表示並無限制地支持自由市場競爭，致使新聞媒體正一點點地兜售亞當·斯密的理論。”

弗裡德裡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對“市場浪漫主義”

韓反復強調亞當·斯密是“市場浪漫主義”的始作俑者。韓引證了斯密著名的《國富論》並且特別注意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這一理論斷言，在實現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同時，社會中每一個人祇追求其自身利益，絲毫不會顧及公共福利。為了推翻市場浪漫主義的這一關鍵的前提條件，韓給他的讀者提出一概問題：“看不見的手為誰的利益服務？”

“讓中國人難以理解的是，當英國商人為了自身利益而向中國傾銷鴉片時，看不見的手如何能夠提高所有人的福利……非洲人難以想像，當歐洲人為了自身利益把非洲人賣到美國的種植園時，他們如何促進非洲人的幸福。亞當·斯密時代的歐洲勞動人民很難理解，他們被迫在黑暗嘈雜的工廠裏每天工作19個小時如何能夠促進普遍的幸福。因此，我們絕對有理由懷疑“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並且有理由質問這一理論代表了誰的利益。事實上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寫《富國論》得到了東印度公司的經濟資助……

“根據《富國論》的解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所犯的罪行是促進普遍福利的善良行為，工廠主對其本國工人的殘酷壓迫也是執行普遍福利的歷史性任務。根據‘看不見的手’的理論，腦滿腸肥的上流社會成員可以對他們邪惡可耻的行為感到心安理得。毫無疑問，出于這一原因，在《富國論》出版後，亞當·斯密成了英國商人和政府官員的寵兒……”

“然而，早在19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即指出在國民經濟和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之間存在着自相矛盾之處。”

韓認為李斯特的著作對今日中國是至關重要的。韓對李斯特發表在1841年的著作《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內容逐題做了詳細的總結。他寫道：“正是在英國以自由貿易攻擊德國的情況下，李斯特揭露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理論的險惡性質。從發展中的德國的立場出發，他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國民經濟概念，大聲疾呼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呼籲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從而為德國成長為經濟大國奠定了理論基礎。”

韓指出德國在李斯特寫作《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那個時代的情況，同今日中國非常相似。盡管李斯特和他的合作者在使德國實現工業化方面獲得了成功——包括1834年建立了德意志關稅同盟和1835年修建了第一條德國鐵路——但和英國相比德國工業依然落後。因此英國便以傾銷廉價商品的方式衝擊剛剛起步的德國工業。但是英國的經濟戰祇有在德國沒有設立關稅壁壘以保護德國工業的國內市場的情況下才能奏效。于是，傳播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主義學說便成為英國向德國（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戰的關鍵內容。韓引用李斯特著作的大段章節說明英國是如何利用亞當·斯密的學說的。他指出當前的“全球化”政策思想實際上就是李斯特描述的19世紀英國“全球主義”的翻版。

“李斯特在兩個關鍵問題上對斯密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首先，祇要存在着國家而不是一個單一的世界主體，那麼這些國家就必然會考慮如何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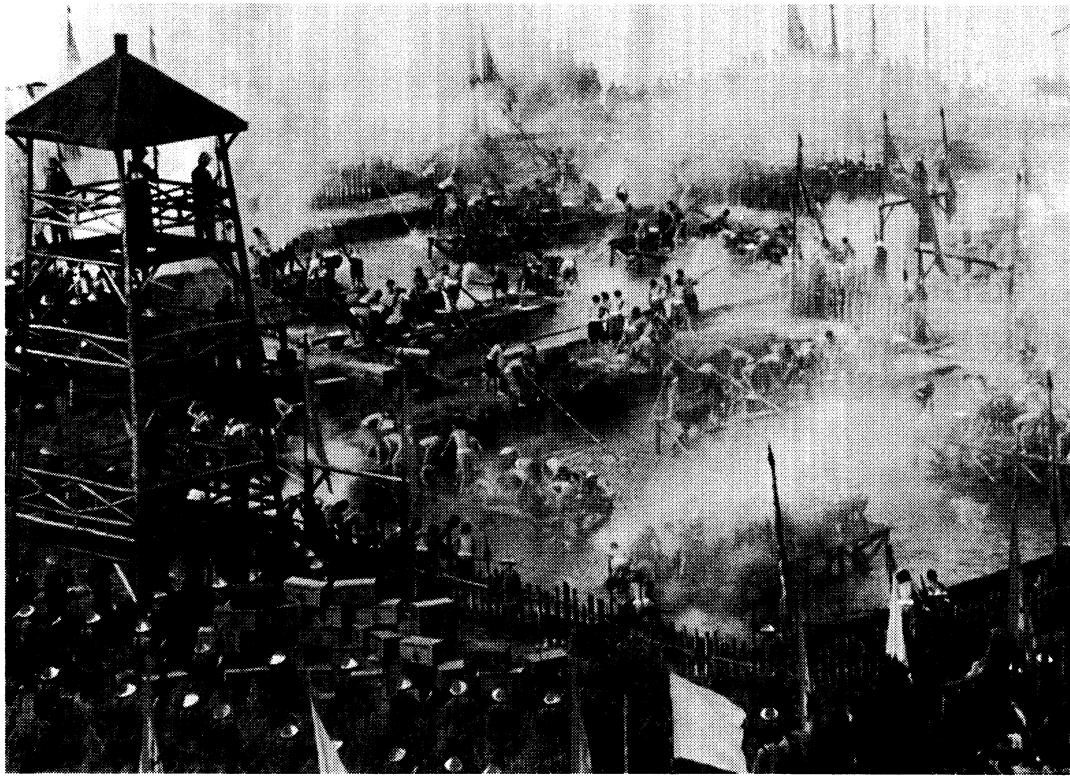
自己其次，李斯特承認發展生產力比擁有固定的財富更重要。”

借助原始摘錄，韓總結出李斯特勞動力現論和有關國民經濟政策的觀點追求的是國家生產力的長期發展而不是獲得暫時的優勢。韓指出美國、德國和法國能在19世紀成長為工業國，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遵循了李斯特的理論而不是“天真地遵循亞當·斯密的理論”。然而，在成為強國之後，正是這些國家“為了阻止任何新的競爭對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天堂，正在效仿英國，它們甚至推崇亞當·斯密的教條，而把它們自己的經驗——李斯特關於國民經濟的學說——掩藏起來，出于這一原因，今天的經濟學家悄悄地將李斯特——19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學家之一——和他的著作移出了經濟學的殿堂。”

按照韓的說法，將李斯特從中國的經濟政策討論中排除出去是導致“市場浪漫主義”蔓延的一個主要因素：“一旦自由市場競爭的邏輯進入人們的頭腦——就此而言自由派人士應該感謝媒體，否則李斯特的國民經濟理論自然會對亞當·斯密形成挑戰——體現這一邏輯的加入WTO自然會成為人們眼中的上帝。”

除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和市場競爭理論外，韓還指出了“市場浪漫主義”的另一根理論支柱，即亞當·斯密的追隨者，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論”，這一理論對中國接受WTO協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李嘉圖認為，在全世界都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每個國家都可以也應該反映投資和勞力集中在那個國家的資源、自然條件、勞動力數量和成本等方面占有極大優勢的經濟區域。這樣，自由貿易就會導致最恰當的國際分工，每一種產品都會在最合適的地方生產。在自由貿易的天堂中，每個國家不僅從它自身的“比較優勢”中受益，而且從以最低價格進口其他地區生產的產品中受益。

亞當·斯密實際上已經將這一原則應用到《富國論》一書，就在美國革命即將到來時，他告誡美國殖民地致力于農業生產，“開發”擁有大片土地的相對優勢，從英國進口所有的工業品。斯密固執地告誡美國殖民地不要建立自己的工業。如果斯密和李嘉圖活在今天，他們一定會祝賀中國在廉



打着“自由貿易”的旗號，英國商人為了追逐個人利益，在中國傾銷鴉片。

價勞動力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比較優勢”，建議中國削減農業，從美國和其他可耕地面積較大的國家進口糧食。

駁斥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韓指出，早在兩個世紀前李斯特已經駁斥過斯密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然而，今天像保羅克魯格曼等所謂“權威”經濟學家却在繼續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兜售“比較優勢論”。

韓特別舉克魯格曼為例。克魯格曼的著作在中國廣泛出版，他被認為是一位權威。韓引用克魯格曼著作中的觀點并將其直接與李斯特的觀點做了對比，以表明克魯格曼如何一而再地回避了李斯特提出的關鍵問題，即發展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是第一位的問題。相反，克魯格曼祇是重複了韓認為斯密和李嘉圖在其荒謬的財富論中表現出來的“方法論上的基本錯誤”。韓指出：

“克魯格曼所說的‘荒謬的錯誤’的確是李斯特的主要觀點，但是，克魯格曼的批評祇是重複

了李嘉圖陳腐的理論，忽略了李斯特在兩個世紀前提出的有生命力的理論，李斯特在當時即指出了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生產力的損害。克魯格曼聲稱，發展中國家必須保持非常低的工資水平，這樣它們才能在自由貿易中享有比較優勢。這意味着發達國家可以有高工資的比較優勢，而發展中國家祇能有低工資的比較優勢，這樣雙方在自由貿易中相互都有優勢。我不知道克魯格曼是否明白非常低的工資意味着什麼，作為中國人，我知道低工資意味着悲慘的生活。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的工資水平大幅度下降，這可以使它們獲得新的比較優勢，在克魯格曼先生看來，這自然而然地表明自由貿易的優越性，但是對東南亞國家而言，這意味着生活水平倒退了 20 年。

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開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非但不會提供優勢，實際上會對各方都造成損害：

“克魯格曼沒有說明進口廉價商品會損害國內生產並造成失業。對落後國家而言，購買生產力發達國家的廉價商品意味着國內難以開發高附加

值產品。對發達國家而言，購買工資水平低的落後國家生產的廉價商品意味着本國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工人將會失業。這是人人都懂的現實。”

(的確，北京為中美貿易協議付出的代價中的一部分是使美國工人運動內部反華情緒增長，他們對從中國進口廉價商品的擔心導致美國工人和工會官員站在反華集團一方)。

韓指出，克魯格曼使用了亞當斯密曾經用過的詭計，將小規模貿易主的活動當作經濟活動的範例。因此，克魯格曼根本不是從生產者的角度，甚至也不是從一個國家長期發展的角度看待問題。從科學的角度看，克魯格曼完全回避了李斯特國民經濟理論的挑戰，他顯然是不誠實的，難道我們應該崇拜這樣的國際貿易理論“權威”嗎？

最後，韓引用了克魯格曼的一段話。克魯格曼駁斥了人們提出的指責，即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剝削廉價勞動力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程度。相反，克魯格曼以中美洲國家為例說：“如果這些國家拒絕輸出勞動力和進行貿易，它們將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

韓評論道：“這種說法缺乏風度和教養，不是學者的解釋，而是赤裸裸的威脅。他的真實想法是，如果你們拒絕接受剝削，你們就無飯可吃更深一層的含義是，如果你們想擺脫資本主義制度，拒絕同我們進行貿易，你們將變得更窮。”

中國和美國歷史上的教訓

“我們來想一想”韓繼續問他的中國讀者對克魯格曼的威脅的反應。“確切地說 1949 年以後美國及整個西方國家都在嘲笑中國，但是艾奇遜却估計錯了。新中國，脫離了西方國家，不僅沒有陷入更大的貧窮，而且迅速地醫治了戰爭的創傷，制止了通貨膨脹，恢復了國內經濟，并開始大規模的工業發展在與西方世界完全孤立的情況下，中國的估計壽命從 35 歲提高了 30 歲，達到將近 70 歲，中國試驗了原子弹和氫彈，把衛星送上了天，研制出洲際導彈。在這一時期，農業和工業生產總價值年平均增長 7.6%，一個完全獨立的工業基礎從無到有，一支由科學家和教育者組成的龐大隊伍，這些為後來 20 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物質基礎。

“克魯格曼忘記了，美國獨立戰爭後，英國仍然繼續威脅着美國。而且這種威脅非常現實，在美歷史上，從 1781~1789 年被稱為‘危機時期’。當時，英國利用它在貿易和機械制造方面的巨大優勢做了兩件事，第一，英國嚴格限制美國的出口，包括禁止美國的商品進入印度次大陸；第二，英國大量地向美國傾銷廉價商品烟草、大米、靛藍染料以及其他農業產品的出口被摧垮了，貿易和航運落後，船舶製造便停頓不前。商人和農民一個接一個地都倒閉了，相互聯繫的鏈條斷了，因此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農民暴動。但是美國人民並沒有因為這些原因而重新回到英國的控制之下，而是以聯邦政府取代了邦聯政府，加強了財政和金融體系，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運用國家的力量與英國進行鬥爭。最後經過很多的磨難，實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政策，發展起一個強大的工業體系。這一段歷史就足以讓克魯格曼閉嘴。

把獨立戰爭後年輕的美國的情況與 1949 年以及今天新中國的情況進行比較，在韓德強書中不斷地出現。在對李斯特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做了廣泛的總結，韓寫了一篇關於“美國崛起帶給中國的經驗——一場關於美國歷史上保護主義和貿易自由之間鬥爭的爭論”的深入詳細的附錄。附錄全面研究了 19 世紀中美國面對大英帝國對這個年輕的國家不繼發動的經濟、政治、甚至于直接的軍事戰爭。發展其民族經濟的曲折的鬥爭歷史。文中概括了前殖民地時期的派別之爭，強調指出這種派系之爭祇不過是在英國反復推選的指示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美國的愛國人士理解了亞歷山大漢米爾頓在期“就製造業問題致國會的報告”中提出的保護民族經濟，建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以及發展的政策，并給予了越來越大的政治支持。韓十分關注導致美國內戰——包括就奴隸制和自由貿易進行的鬥爭——的過程，它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繼續。韓強調指出，內戰包括內部戰爭和反對英國的外部戰爭，他通過大量的資料論證了英國做為反聯邦派事實上的重要軍事同盟和支持力量起到的作用。韓指出，在這場戰爭中聯邦取得了勝利，因此使美國 19 世紀末發展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大國成為可能。

不要在有糟糕的妥協

韓在他的書中呼籲中國丟掉所有“糟糕的妥協”，并按照李斯特的“美國體制”執行保護民族經濟發展的嚴謹政策。除了簡單地保護國內的生產者之外，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用于建設具有戰略的、關鍵的工業部門，強化其國內先進技術的基礎，使之朝着向人們提供有益的就業機會，并有效地利用國家資源的方向發展。韓引用了中國有關討論中的觀點，即建立為發展農業提供機器設備的中小型企業；創建高效的公共運輸系統（與過分強調個人購買汽車的觀點相反）；通過開發基礎建設項目發展中國西部地區等等。

韓指出為了使國家投資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取得滿意的結果，必須有效地治理腐敗，除此之外，韓批評了“刺激國內需求”的凱恩斯理論——經常在中國被援引證明基礎建設投資的合理性，但是它本身對經濟政策的制定幾乎不能提供足夠的基礎。

韓為了強調經濟政策必須嚴謹，他用一章的篇幅批評所謂的“市場現實主義者”，由於技術的原因而在一定程度贊成保護主義，而事實上完全擁護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關於英國體系的理論，空洞無物的觀點。一個典型的“市場現實主義者”自稱贊成自由貿易，但不幸的是他却承認在目前的現實世界裏純粹的自由貿易的理想不可能被認同。類型的還有典型的非凱恩斯主義者，在很多國家的中左派中有影響，他們經常以頑固不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政策的“取代者”的面目出現。這些非凱恩斯主義者要求國家對經濟進行投資和實行幹預，而在現實中却反對漢米爾頓和李斯特倡導的主權民族國家的發展政策。韓從大量批判主義理論中挑出阿根廷經濟學家及聯合國官員保羅·普雷比斯切（1909-1986）他的“發展”學派在拉丁美洲及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政策有很大影響。韓特別批評了普雷比斯切著名的“中心和邊緣”的理論，該理論表面上完全支持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事業，但事實上，正如韓指出的，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理論畢生的追隨者的結晶”。普雷比斯切作為的英國代理人是拉羅什理論著名的支持者，他以反對在拉丁美洲建立漢

米爾頓式的國家銀行體制而著稱，贊成建立英國式的獨立的中央銀行。

至于凱恩斯主義本身，韓說：“祇有在大蕭條的時期，那時統治集團喪失了對經濟的控制，而且‘市場不再有效地運轉’，才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國家實行幹預。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並不真的反對市場浪漫主義，相反却對此作了有限的修改。把市場作用與政府按照‘退一步、進兩步’的方法進行的宏觀經濟調節結合起來。強化市場的核心作用，因此從根本上保持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

保護主義仍能再生嗎？

韓用整個一章的篇幅討論這一問題，在此駁斥了廣泛流傳的關於保護主義是過時的“19世紀的遺物”說法。韓認為情況正好相反，首先，美國盡管普遍擁護世界範圍的自由貿易，但事實上却為保護其本國市場採取了大量的保護主義措施，同時在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保留了單方面執行更強硬措施的權力。臭名昭著的“超級—301”條例僅是其中一例。在此方面，韓指出，美國的政策很像19世紀時期的英國典型的兩面政策：英國實行保護主義而其他每個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另外，盡管實行全球化政策，而日本和歐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繼續實行保護主義。所以保護主義方法決不僅僅是歷史的遺物。

其次，也是比較重要的一點，韓指出，世界正處在新的大蕭條的邊緣。他比較詳細地回憶了長期以來造成目前世界市場巨大的泡沫金融的重要原因，并指出目前很多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學家都可能發生一次新的蕭條。

韓指出，如果我們看一看過去200年工業革命的歷史，包括美國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保護主義統治時期和那些自由貿易占上風的時期會交錯出現。但是他強調說，在這一反復過程中，自由貿易時期相對比較短暫。在危機和衰退的時候，美、德、法以及其他工業國家反復回頭來採取保護民族經濟的措施。實際上，世界已經走上向“保護主義新高潮”發展的道路。在此情況下中國應

該丟掉天真的幻想，關注于正在發生的現實，并且停止向一種已行將滅亡的體制讓步。

中美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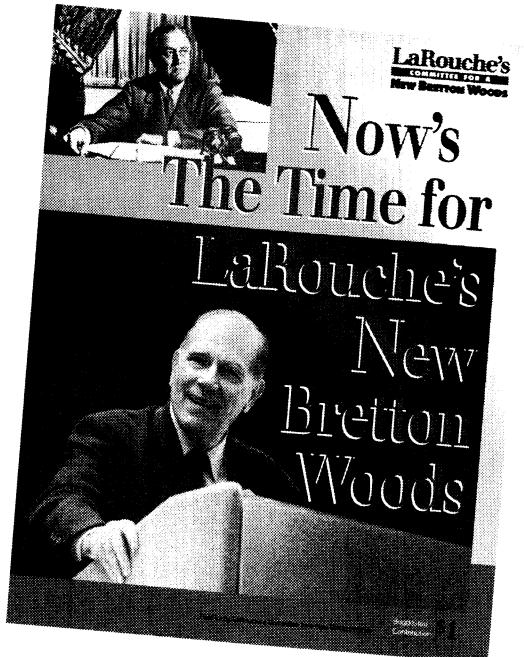
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韓德強對美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摒棄它最好的傳統，轉而使自己成為一個英國模式，即全球化的帝國政策的世界冠軍。韓告誡說從層意義上講美國已經使它自己變成了中國的對手，因此中國人民應該清楚地認識這一點。作為一名滿腔熱忱的中國愛國者，他看到了中國是那些致命性政策的“受害者”。然而韓反復提出早期的美國反對英帝國的歷史鬥爭是今天中國需要接受的教訓的同時，他沒有強調要繼續進行消除英國政策在美國國內影響的鬥爭。

韓提出了問題：在美國政府，包括克林頓本人正試圖把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政策，如果採取之，將意味著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的全面覆滅，強加給中國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怎麼可能會是“戰略伙伴”呢？中國天真地希望和美國“成為好朋友”，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存，那豈不荒唐可笑嗎？此外，韓還指出，美國的傳統是“欺侮其朋友，看重其對手”。如果中國嚴厲地拒絕“全球化”，並堅持推行一項獨立自主的保護民族經濟發展的政策，那麼它不是更能贏得美國的尊重嗎？

韓並不贊成與美國形成對立，相反則提出如果中國嚴格執行這樣一條政策路線，實際上將會為兩國之間的關係的“真正發展”奠定唯一可能的基礎。與此同時，中國應該執行一種與世界範圍內的那些反對“單極化”世界秩序，即布熱津斯基、喬治布什及其他一些人主張的、由世界上極少數人統治，的國家和政治組織聯合的外交政策。中國的自然盟國將首先包括俄國、發展中國家、歐洲大陸國家等等；而且，至少就不斷發展的前景而言，其中也包括美國自己。

中國公民的教育

在書中最後部分，韓指出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形勢——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傳播導致的結果——已經沒有希望了，而且腐敗和利己主義已積重難返。但是他說，這些問題並不是“人類本質”的問題，



目前在美國，有1百多萬份宣傳品在流傳。要求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全世界幾百名政界人物，包括議員，經濟學家，勞工領袖，前國家領導人等都在乎吁書上簽名，要求建立一個新的布萊頓森林體系。

而是社會環境造成的。腐敗存在是人們不能理解他們個人的長遠利益和整個社會利益之間關係的結果。反過來說，還需要為解決教育的問題做大量的工作。韓引用了鄧小平的一段話——中國前任領導人在此對關注國民教育不夠表示出歉疚。鄧小平說“我說的是政治教育，而不僅僅是學校教育和對年輕人的教育；我說的是國民教育的缺乏有關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太少了，這是我們的最大失誤。根據此話的精神，韓德強在其著作結尾呼籲就基本政策問題——包括他書中提出的所有問題——在中國進行公開、廣泛的公眾討論。韓寫道如此這樣的討論對打擊腐敗，加強政府和黨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他提到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這一震驚事件在中國的反應，它不僅激發起一股愛國主義情緒，而且引起很多人對今後他們的國家及他們個人在世界上的作用的問題進行嚴肅的思考。

本文中的譯文與作者原文有出入。特此向韓德強和讀者道歉。

新“布萊頓森林”計劃特別委員會

以下的電話是從 2000 年月 7 日開始打來的。

在防止全球金融體系面臨崩潰的時刻，世界七大工業國政府對於迅速使用徹底有效重組金融體制的方法表現出遲疑不決與無能為力。此一事實促使所有意識到金融體制危機將帶來的毀滅性影響的各國有識之士必須大聲疾呼。

我們這些簽名的呼喚者們一致推舉和支持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先生。他長期以來深入地研究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同時，也精心設計了克服危機的完整措施。這就是著名的防止金融危機再度發生的新布萊頓森林計劃。

我們注意到歐洲議會一些成員最近表現的行動。他們宣稱。

歐洲議會決議如下：

- 鑑於 1944 年布萊頓森林協議對實現金融穩定和戰後經濟重建的貢獻；
- 鑑於自從美元與黃金儲備制的分離，現實經濟與金融出現了脫離；
- 鑑於自 1997 年以來，世界不同的地區均爆發了數起金融危機；
- 鑑於國際貨幣金融性機構正在喪失執行職責的功能；
- 鑑於現已確定“投機性泡沫效應”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并全盤改變了結構造成金融投資規模膨脹至少高達 300 萬億美圓，相對於，全球生產額祇有約 40 萬億美圓；

姓名

地址

單位

因此歐洲議會邀請歐洲委員會：

第一) 提議召集類似於“布萊頓森林”計劃的新會議，以創立個新的國際貨幣體制為目標，逐步取消造成“投機性泡沫效應”的舊機制。

第二) 評估貨幣值與具有真正對比值的物質相挂鈎的可能性，以此來更好及更完全地控制匯率的浮動。

第三) 建議設立一個新的信用基金，旨在加大對實物經濟部分的投資並規劃在歐洲大陸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

在現實環境中最危險與荒謬的是，一方面，美國白宮與歐洲共同體政府領袖們在慶祝所謂“新經濟時代”的偉大成功，而與此同時的另一方面隨着新經濟神化一起膨脹泡正在崩潰。所謂“全球化”，不僅遠遠沒有促進世界經濟成長和發展，事實展現了“全球化”祇是脫疆了的掠奪資本主義的另一形式。一方面它擴大了金融投資機構與現實經濟的差距，另一方面它加大了樂貧富懸殊。

令人無法忍受的是：這不僅是在國家更是在國際層面上事矣。為挽救此一經濟體制上急速行成的危機，我們，以下的簽名者，決定共同一致的推動新布萊頓森林計劃的實現。

請簽上妳的名字，然後請寄回到：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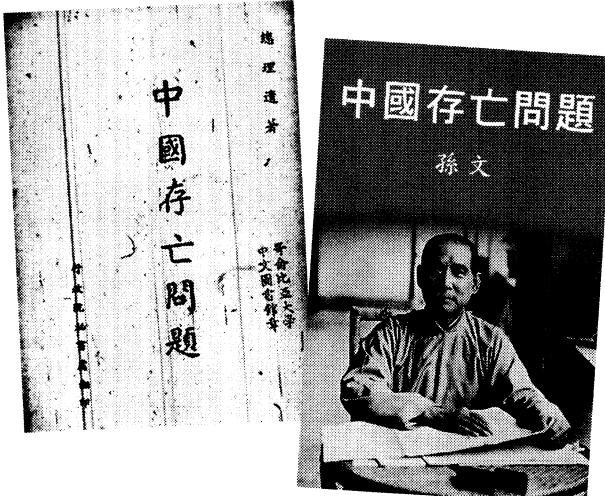
孫中山遺作再度面世

《中國存亡問題》

絕版多年席勒學會找出原版重印紀念國父冥誕

【世界日報紐約訊】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公元一九一七年正值第一次大戰初期所寫的一本書《中國存亡問題》，在絕版多年之後，由美國的席勒學會從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中找了出來，重印此書以紀念中山先生一百三十歲冥誕。

據推測《中國存亡問題》未在中國國內重印的原因，可能是中山先生在書中強烈指責英國強迫中國參加一次大戰，在中國當時及其後的環境下缺乏政治上的「正確性」。中山先生認為德國與英國相較，雖對中國有所侵略，但沒有英國嚴重，且無當時英國勾結日本企圖徹底滅亡中國之心，因此在書中反對中國加入一次大戰向德國宣戰。因為中國參加歐戰與英國共同對抗德國，對中國毫無利益可言。孫中山先生且預言在戰後，英國及日本將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進行侵略。孫中山先生在書中也批判了大英帝國的基礎，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之上，其外交政策翻雲覆雨，莫不以大英帝國為優先，力邀中國參戰亦惟如此，英國戰勝後必會與日、俄分裂中國。中山先生的預測，在一戰之後不幸言中，中國又成為英、俄、日的勢力範圍。



在再版的序言中，國際席勒協會 (Schiller Institute) 主席海爾嘉·拉魯旭夫人指出，孫先生的著作對英帝國的分析入木三分，「在與歷史上的任何時間相較，今天的中國如要擺脫眼前的危機，中國之存亡在六十年前即已提出了答案。」

再版的《中國存亡問題》有蔣緯國在感言中說，國父在書中指出，一國之存亡，寄予其國家及其國民獨力不撓的精神，在中山先生一百三十週年冥誕時重印此書，彰顯孫先生的明智，並再啓中國的光明。

有意購買《中國存亡問題》，請寄信：

H.S.D.I., P.O.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中國存亡問題》郵購價格：每本\$6.00 (郵費\$1.5)；五本以上，每本\$5.00 (郵費免)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三期一九九六年三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你想學習經濟學嗎？》（第二章）
林登·拉魯什及其實物經濟學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七、八合期一九九六年八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歐亞經濟發展大計劃出臺

海爾嘉·拉魯什25年後再次訪華談歐亞經濟發展
新亞歐大陸橋區域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發言摘要

全球策略信息

第七卷第四、五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通向復蘇之路

全球策略信息

第十一卷一、二期二零〇〇年三月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美國選舉中的虛偽與騙局
布羅林參與總統競選的背景
傀儡皇帝李登輝

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布萊頓體系

全球策略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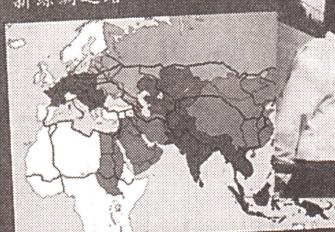
第七卷第一、二期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古典概念

拉魯斯之為人，為師，且為藝術家

新絲綢之路：二十一世紀的



全球策略信息

第六卷第九期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結束「特殊關係」——克林頓福拉英國人
英國地緣政治的歷史與今天



Table of Contents

Vol. 11, No. 2

July 2000

- LaRouche holds dialogue with Peruvian leaders
- China Need Protectionism and the ideas Friedrich List
- The Ad Hoc Committee for a New Bretton Woods

全球策略信息訂閱單

\$35 訂閱二年 \$20 訂閱一年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Telephone: _____

H.S.D.I.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0058, U.S.A.
Tel: (201)-641-8858
Fax: (201)-641-0453

責任編輯： 陸淋灑
Leni Rubinstein

歡迎電詢，寫信，投稿，或購買書刊

E-mail Address: Leni_R@MSN.COM